



从合作 走向 决战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战胜国民党

徐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徐焰，国防大学技术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少将军衔。现兼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先后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山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并荣获“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和“全军杰出科技人才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日本防卫大学做访问学者和讲学。二十多年来出版学术著作二十多部，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日、英文出版，199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对日作战史录》，是战后唯一一部全面阐述中国观点的抗战史专著，江泽民主席当时曾为此书题辞。此外，还撰写过几十部电视剧剧本并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播出，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嘉宾。

从合作走向决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徐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 徐焰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 7（2016. 12重印）

ISBN 978-7-5454-4736-1

I. ①从…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②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IV. ①D231 ②D693.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1811号

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CONG HEZUO ZOUXIANG JUEZHAN——ZHONGGUO GONGCHANDANG
WEISHENME NENG ZHANSHENG GUOMINDANG**

出版人：姚丹林

责任编辑：周晶 毛一飞 刘倩

责任技编：许伟斌

封面设计：罗洪

出版	<hr/>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兴旺路）
开本		73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422千字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2次
书号		ISBN 978-7-5454-4736-1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020）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510075

邮购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020）37601980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P r e f a c e

唾弃青天白日 选择铁锤镰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至2016年已经走过了95年的奋斗历程，从成立之初的57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8000万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如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在新的征途上扬帆奋进。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于1905年成立，1912年在辛亥革命结束后改用此名。1928年北伐结束后，国民党曾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因其逆历史潮流而被人民革命所推翻。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余部撤到台湾，此后事实上变成台湾一个省的执政党。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也逐渐发生质变，自身力量日益衰落，在2000年和2016年的两次选举中丧失了执政地位，党员数量由1980年在台鼎盛期的240万人降到2013年的38万人，且还有减少趋势。

编者注：前言图片为著名画家金山石等人的油画《义勇军进行曲》，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恩怨交织了几十年。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共产党人很重视同盟军的作用，曾经与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有效进行了北伐，第二次合作成功进行了全面抗战。不过这两次合作都以破裂告终，之后国共双方进行了殊死的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为进行国民革命，从1924—1927年以“跨党”即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了“党内合作”，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采取“清党”的屠杀政策结束了此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上山开拓根据地，组织红军同对手的“围剿”进行了十年血战。

1937年夏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蚕食变成了鲸吞，国共两党就此停止内战，一起共御外侮。民族战争在当时的中国“四万万同胞”面前，也摆下了一个选择机会，民心投到哪一边，哪边就会得天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本强大的国民党失去江山，逃到海岛上靠美国舰队保护才得以存在，共产党最终得了天下。在中华大地上，“铁锤镰刀”战胜了“青天白日”。

对于国民党的党旗，人们大都不会陌生。即使生长在新中国的人，也会在电影、文物和旧书刊上经常看到那个1个大圈加12个齿的“青天白日”图形，国民党的军队也将此徽记顶在帽子正中。“中华民国”的国旗，则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加上“满地红”底子，以显示国民党是以党治国。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象征着工农两大阶级劳动工具的“铁锤镰刀”，显示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当中国革命的凯歌高奏时，共产党领导下的阵营除工农外又加入了两个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图案所代表的天下大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为“青天白日”与“铁锤镰刀”的斗争，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雄。外国势力的介入，更为这种较量增加了波谲云诡的色彩。1949年4月下旬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的纪录片留下过这样宝贵的镜头——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冲上南京“总统府”的门楼，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上了“铁锤镰刀”的红旗，从而向世界展示出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

国共两党的斗争是残酷激烈的，为此死亡了成百上千万人，然而，双方的关系长期来说又是十分紧密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发现某个干部在历史上曾加入过国民党，马上认为这下可找到了弥天大罪的证据。那些不懂历史却又有权审查别人历史的无学无识之辈哪里晓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产党组织包括绝大多数党员都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毛泽东还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以“跨党”身份在其党内任过职。

共产党的多数老前辈加入过国民党，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也同情、联合甚至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至今为止的四个最高领导人中，“总理”孙中山不仅联俄容共，还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总裁”蒋介石虽长期反共，却也公开宣布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前“主席”蒋经国不仅加入过共青团，也参加过共产党。就连1988—2000年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关系却又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正体现在这里。共同对付外敌时可以说“兄弟阋墙，外御其务”，时移世易后可以吟诗“历尽劫波兄弟在”，可在当时却是难以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殊死之争。过去人们常愿意用“兄弟般的”一类词句形容两国或两个党派关系亲密，其实古往今来兄弟间的同室操戈往往最为激烈。正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所云——“人间朋友犹能和，自古兄弟不相容”。

兄弟之所以不相容，恰恰在于在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可分割的体制下，关系相连越紧利益就越难达到满意的分配及调和。近现代的党派之争，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之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浴血厮杀，并非像近年来某些人荒谬地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所不可避免的产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时，是抱着以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来救国救民的志向，党歌第一句话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可是他的门生们“革命尚未成功”便骄奢淫逸，只统治了半个中国就实行独裁专制加腐败，使天下民不聊生，以致有人将国民党党歌的第一句词改为“三民主义，狐党送终”！



正是这种政治极度黑暗、吏治严重腐败和百姓无比痛苦的社会条件，给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社会基础。“红旗卷起农奴戟”的暴动、起义和创建红军，以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镇压、围剿，构成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基本图景。东洋鬼子的入侵，使双方暂时走到一起共同抗日，却也并未停息国内阶级间的争斗，而且，随着外敌威胁的减轻，内战愈演愈烈。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民族、民主革命两大旗帜，赢得了天下多数人的心，于是国共双方力量的天平就日益向一边倾倒。在中国大地上以“青天白日”自诩、一党独尊却仅维护少数富豪利益的“党国”，遇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手持“铁锤镰刀”的劳动者，在解放战争期间又发展为与五星红旗上那颗大星星照耀下的四颗小星——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为敌，其最后的命运就毋庸龟卜。只因有一道海峡相隔，再加上美国第七舰队借朝鲜内战爆发之机前来救援，国民党势力才能龟缩并偏安台湾一隅，事实上其已变成了中国一个岛屿省份的地方政权。

现代史学研究强调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如果从宏观上对国共斗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行评论，那么可以这样说：

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是中国革命力量在艰难苦斗中创建武装并求得生存的阶段。

抗日战争的8年，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全民族抗战的大好时机，极大地积蓄发展革命力量的阶段。

解放战争的4年，则是中国革命力量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累起来强大实力，与反革命势力最后决战并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三大战役又是决战的最高峰。

战略决战一胜，中共就提出八条二十四款，实际是要国民党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如此宏大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生动多姿。

有关1937年以前的土地革命，已经有无数篇章将其描绘。本书所要讲述的，则是1937年以后12年间这一段曲折而又充满戏剧性情节的史话……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一 十年仇敌，共御外侮

“香蕉帝国主义”来“帮大忙” / 2

卢沟桥炮声解决了双方争执 / 11

戴国民党军帽的不平等合作 / 20

洛川一会定方向 / 25

是否建立新四军之争 / 31

国共形成两个战场 / 36

“游而不击”和“消极抗日” / 42

二 合作乎？溶化乎？

两党的三种合作方式可供选择 / 52

暗算与摩擦 / 58

黄桥奏凯 / 70

皖南悲歌 / 75

林彪代表毛泽东赴渝见蒋 / 82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 91

三 “三国四方”都瞄准战后

中共“先夺取半个中国”的计划 / 97

“南渡君臣”坐等胜利 / 100

中美合作所与迪克西使团 / 103

雅尔塔的强权交易 / 110

蒋介石惊叹盟友“已卖华乎” / 117

延安与“远方”日渐疏远的关系 / 120

胜利日却签订不平等条约 / 124

四 抗战胜利突来，双方各有忧虑

“剑外忽传收蓟北” / 133

毛泽东在枣园空前紧张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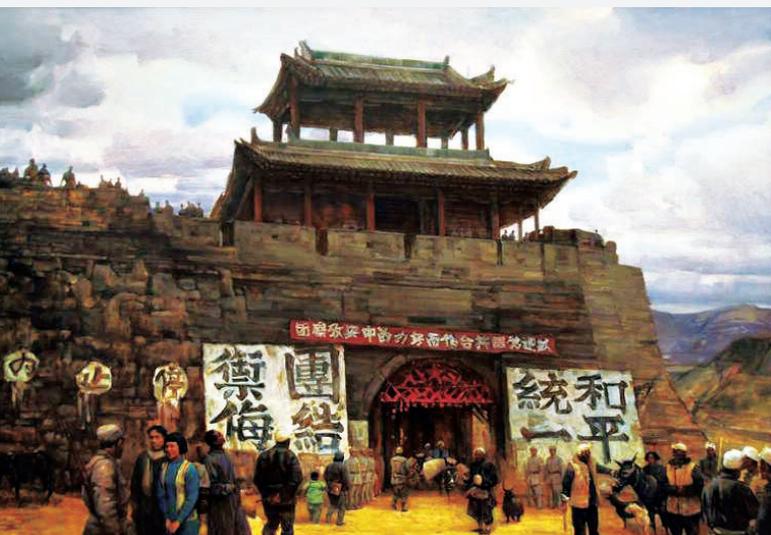
蒋、伪迅速合流反共 / 141

利用日军当“守备队” / 149

八路军、新四军争夺“桃子” / 156

6万美军登陆中国沿海 / 161

“劫收”到城市却失去人心 / 164



五 两大对手渝州相见

- 毛泽东提出学习法共 / 171
- “美国姑娘”降落延安机场 / 174
- 互知底牌的艰难谈判 / 178
- 未达成具体协议的《双十协定》 / 187
- 国民党阵营“窝里斗”的启示 / 192
- 围绕《沁园春》的诗词唱和斗争 / 196

六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 有了东北即有全国胜利 / 204
- 不明苏军态度，先派部队侦察 / 207
- “此真千载一时之机” / 215
- “全国战略方针”核心在于争取东北 / 220
- 国民党进军东北碰壁 / 224
- 出尔反尔的“辰兄” / 229
- 变“独霸东北”为“占领两厢” / 236
- 率先向雅尔塔体制挑战的人 / 240



七 “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设想

- “和平使者”马歇尔带来的短暂停战 / 244
- 《停战协定》生效前双方的争夺 / 249
- “一国两制”设想的雏形 / 253
- 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 259
- 四平失守，鲁晋出击 / 265
- 毛泽东认为“上当了” / 271

八 国共最后破裂

- 争取六个月大胜后议和 / 276
- 蒋介石的五项要求 / 282
- 坚信“蒋军必败” / 284
- 进攻张家口意味着谈判决裂 / 291
- 谈判代表“坚持不撤，非赶不走” / 295
- 变“洗脸”政策为“杀头”政策 / 302

九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自卫战争”变成“解放战争” / 308
-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 312
- 两条战线前后夹击 / 319
- 胜负天平上最重的砝码——农民 / 324
- 扭转历史车轮展开全面反攻 / 329
- 三大战役定乾坤 / 334
- 无人当“文天祥”“史可法” / 339

十 “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无条件投降”

- 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回复斯大林 / 349
- 李宗仁上台后“一国三公” / 356
- 以“联桂反蒋”为方针的北平谈判 / 361
- “宜将剩勇追穷寇” / 368
- 最后挣扎的广州—重庆—成都政权 / 378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 384





十年仇敌，共御外侮

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发生西安事变及随后停止剿共一再表示悔恨，并在1956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自认为这是他终生最大的憾事。其实，这非不愿，乃不能也。有道是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天下大势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曾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以“千古功臣”的美誉，正是由于这两位功臣主持发动的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国共十年内战，事实上开始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国共合作。日本军阀当时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实行鲸吞政策，恰恰是促成西安事变乃至全民族一致对外的主要契因。

毛泽东于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起当年的日本侵华问题。那个年代来华访问的日本宾客一见到中国领导人，即使自己不是战时的当权者，也大都羞愧满面地说“对不起”，为本国的罪责道歉不已。毛泽东则以辩证的方法谈起了日本侵华的“两重性”：



杨虎城将军



张学良将军



“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①

这一“帮大忙”的观点，毛泽东还对许多日本友人谈过，于是有些对历史无知或别有用心者又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历史唯物主义早就说明，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的入侵，除了有野蛮掠夺的一面外，同时也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的工具”，即唤醒了这些原来还在沉睡中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向入侵者学习，从而最终摆脱被压迫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从反面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否则中国人还会长久地沉溺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中，男性仍会留辫子，女性仍会缠小脚。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同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由于日本以极其野蛮凶悍的方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才使国共两党又在抗日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中国共产党才在日本侵略军后方的广大区域开辟了100万军队、1亿人口的根据地，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特！

“香蕉帝国主义”来“帮大忙”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遇最凶恶的外敌，正是那个肤色与我相同，还自称是“同文同种”的日本。被有些人称作“香蕉帝国主义”的东洋鬼子，其野蛮侵华从反面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也得出了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结果。

研究中日关系历史的人曾有一个形象的总结，从7世纪唐代即日本的“飞鸟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日战争结束，这一千多年里日本人看中国，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从8世纪的“大化革新”到13世纪的镰仓幕府时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典章进行全面学习，此阶段日本人对中国处于崇敬的仰视之中。

13世纪末，蒙古人统治中国所建立的元朝派出大军渡海攻日，结果遇上被称为“神风”的台风而全军覆没，加上其后中国的明王朝日益衰败，日本的丰臣秀吉就有了“征韩”并进而征服中国的设想。1592—1597年，丰臣秀吉派遣大军进攻朝鲜，中国的明朝派兵进行了一场“抗日援朝”战争。明军虽然损失惨重，却毕竟和朝鲜军一起打退了日军，因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大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页。

都不敢轻视中国。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6个世纪里，日本人对中国基本上是平视。

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人对中国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阶段。日本在自身取得社会改革成功后马上藐视并压迫自己的亚洲邻国，并以发动对华战争且轻易取胜为起点，滋长了傲慢狂妄的“东亚观”。这样，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虽为亚洲国家树立了一个摆脱落后而赶超西方国家的榜样，可是其当权者在本国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不是努力提携邻国，而是按照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将自己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不仅自视与欧洲人同类，还以与西欧殖民者同样甚至更厉害的态度对待与自己同一肤色的亚洲同类。



如今作为1万日元头像的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脱亚入欧论”的倡导者，即主张日本学习西方，凌驾于亚洲邻国之上。

据20世纪初乘过国际航船的老者回忆，当年欧美轮船公司由于歧视有色人种，往往为白人和黄种人各开售票口，日本人却能享受白种人待遇。日本自己开办的船运和铁路，也是优待白种人和本国的正宗国民，对于同肤色却被蔑称为“支那人”的中国人，以及被吞并后称为“归化人”的朝鲜人及亚洲他国的人，则是低一等对待。正因为如此，那时的许多中国人以“外黄内白”的香蕉来比喻日本，称日本是“香蕉帝国主义”。

了解东洋民情的人也知道，近代乃至现代的日本社会对世界上各大国的态度是：最崇拜美国人，最怕俄国人，最看不起中国人。对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亚洲其他小国，日本则更将其视为等而下之的奴隶。

正因为如此，尽管自明治时期起日本有些人也鼓吹过“大亚洲主义”，却在中国社会激不起什么反响，不仅不能造成亲日情绪，反而使人更警惕日



本与西方殖民者共同瓜分亚洲或由自己统治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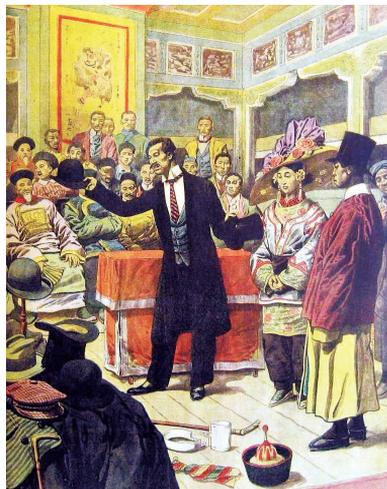
在中国近代，欧美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主要还是夺取沿海一些要点作为“租界”，当成谋取经济利益的通商据点，并没有大片吞并中国领土。日本和俄国对中国的入侵，却是以直接占领大片国土为主要目标。虽然中国受日俄两国侵害最深，可是近代中国人却最热心学习这两国，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又是学习的主要对象。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出洋者，大多数是到日本。他们从东洋留学归国后，在思想文化上大大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仅就语言而论，现代汉语有800~1000个新词汇来自于日语，如“干部”“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词汇，大都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在古代，可以说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而在近代，日本文化也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当年的中国人诚心诚意地以自己的东亚邻国为师，被当作师傅的日本人却一再欺负自己的徒弟，并要将自己的种族凌驾于东亚各民族之上。这类种族优越的思想，正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研究近代史的人虽然认定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由北一辉奠定，然而那种从明治维新以后日益滋长的“脱亚入欧”、自视优于邻邦其他民族观念，正为法西斯思想的传播和以后中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入侵，对中国人也造成了最大的刺激。过去被西洋大国打败犹可自解，可是连连被自己过去的文化附庸欺侮，这不能不逼人奋起。于是，如同人们所形容的那样，甲午战争“惊醒了四千年沉梦”，引来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二十一条”的苛刻条款及由此导致的日占山东权益，又逼出了“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中国开始局部抗战，“七七事变”则逼得中华民族全体奋起与日本拼搏到底。

战后国民党在讲历史时总抱怨抗战爆发有利于共产党，其实日本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后，蒋



这幅西洋画表现从日本归来的中国人带头穿西服的场景。

介石在名义上虽然居于国民党内的最高位，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全党，更谈不上统一中国。当时人们对国民党的戏称是——“一个党、两个政府、三个党部、四分五裂”。

所谓“一个党”，是指对外号称只有一个国民党。

所谓“两个政府”，则是指1927年以后先是有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立，后来蒋冯阎大战时又出来一个北平的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接着又出来一个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

所谓“三个党部”，是指既有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党部，又有以汪精卫为首的党部，还有西山会议派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党部，都自居为正统。

这样一个名副其实“四分五裂”的“党国”，自然连年内部混战不已。国民党各派一面与共产党打，一面自己互相打。例如，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那场国民党军阀自相残杀的混战动员了百万兵力，规模之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仅次于后来的国共内战。在“蒋记”国民党历史书上，这被称为“讨逆”战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自居为“正”。可是，当年反蒋的国民党其他派，也都称蒋介石为“逆贼”，只是因为南京政权最后占了优势，因此自然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对战争如此钦定加谥。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广州两个国民政府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于1931年年末实现了“宁粤合作”。广东方面推举的元老林森当了主席，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权却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里。不过，直至“卢沟桥事变”前不久，这个“蒋委员长”实际能控制的也只是东南和中原几省，其他各省仍是割地称雄的军阀们自成一统。

例如，当时的河北在宋哲元手里，山东在韩复榘手里，陕西在杨虎城手里，宁夏和青海在马家回族军阀手里，四川在以刘湘为首的十几个川系军阀手里，西康在刘文辉手里，云南在龙云手里，贵州在王家烈手里，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手里，广东在陈济棠手里……其实这些人都不服从蒋介石。

此外，这时国内还有一支失去了地盘的正系军阀部队，即张学良率领的十几万东北军。他们在老家沦陷后流落关内，实际上成了武装难民。带队的张学良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对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怨恨不已。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陕甘，是想一石三鸟，既消耗这支杂牌军的实力，又挤掉西北军旧部杨虎城的地盘，还可以打红军。结果张学良、杨虎城洞悉其奸计后更为愤恨，反而与红军走上了“三位一体”的联合之路。



由于日寇入侵的亡国之患日深，当时在国民党内恨蒋不抗日的不独张学良、杨虎城，当权的实力派中要求联共抗日者几年间接踵而来，早已为华清池那一幕惊险的“捉蒋剧”揭开了序幕。

且看——

1933年先有蒋介石的换帖“大哥”冯玉祥在察哈尔秘密联合共产党组建抗日同盟军；

1934年又有当年的广东头号实力派李济深及其下属蔡廷锴等人发起要求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

1936年6月又出现了广东、广西军阀联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两广事变”……

1936年12月接着出现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若是历史阴差阳错地没有了西安这一事变，肯定接着别的主角又会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以别的样式演出同样内容的政治剧目。

此非天数，形势使然也。东京千代田区皇苑内那个野心勃勃的头号战犯在其最崇拜的拿破仑像前迫不及待的狂想，以及他手下以“三羽乌”为先导的宫廷党羽集团对神州大陆的步步紧逼，使得上海电影厂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也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在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手无寸铁的学生发出吼声，是在街头举着小旗游行示威。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出吼声，那就是用枪口逼着最高当权者对日作战了！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入侵面前退让卖国之甚，当时确也到了使国人忍无可忍的程度。

人们常骂清朝政权腐朽、卖国、无能，实际上，清朝统治比昏暗的明朝要好得多。仔细算起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时，原明朝中央政府直辖的疆域只有320万平方公里，清廷连同自己的旧地，再将西部各地汇合入多民族的清帝国的版图，至鸦片战争爆发时已有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此后直至因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共割让给俄国、日本和英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清廷还留给中华民国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可是在民国年间，政府之腐败和丢失国土之多更甚于晚清。尤其是国民党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几个月就丢失了东北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外，对蒙古、西藏等地也无法控制，国民政府的政令实际出不了南方和中原十余省。对剩下的土地，日本人还步步紧逼，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国民党内多数人认为只有停止“剿共”及对其他各派军阀的“讨逆”，联合国内的一切

力量共同对日才是当务之急。

这样，从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开始，国共两党拼死厮杀了多年，却又逐渐走到一起，日本的入侵是决定性因素。从1931年9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不仅中国国内各阶层群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益不满，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英美等国对华对日政策也有所改变，苏联则从维护自身安全及支持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进行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仍处于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处境艰难，不过通过克服党内“左”的路线，也日益认识到实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那个一贯极“左”的王明这时也干了一件好事，1935年8月1日由他起草的《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当然，这一宣言也是苏联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准备联华抗日的表现，同时也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内多数人的意见促成，应算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真正的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与外界电讯联络中断，这一宣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外号召，要求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八一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又派张浩^①到陕北传达这一精神，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一步作出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政策上的一大转变，即由武装反对国民党代表的国内统治阶级，转变为争取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转变很快落实为实际行动。1936年5月，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作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坚持九年的“苏维埃”的旗帜。中共中央不仅向南京政府联络，同时也向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多方联系，动员他们出面制止内战。这些占据一方的割据者毕竟还有民族之心，加上红军已不威胁其利益，停止内战也可使蒋介石不致吞并他们，于是各派力量大都秘密表示赞同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

此时关键性障碍是把持南京政权的蒋介石。此人虽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过考虑到对日战争在即，长江下游威胁自己腹心地区的苏区又已剿灭，对共产党的恐惧也有所缓解。从联合苏联并以和平方式溶化中国

^① 中国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共产党的目的出发，蒋介石施展了两面手法，在继续“进剿”红军的同时，于1935年年末通过驻苏联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开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

任何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双方开始谈判时，红军还在川陕甘湘几省活动，国内一些实力派也积极反蒋。1936年7月，日本驻华大使又向南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威胁性条件，蒋介石首次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而表示拒绝，中日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代表潘汉年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会晤，国民政府一度降低了要价，同意在红军服从国民政府的前提下，保留其基本力量，由国民党方面供给薪饷参加对日作战。

可是“两广事变”被蒋介石迅速解决，情况马上有了变化。广东、广西两省军阀所发动的反蒋事变，是以“抗日救国”要“借路”北上之名出兵湖南，其实是国民党的内讧。两广距抗日前线当时还相隔万里，出兵北上分明是要抢老蒋的地盘。陈济棠在举事前还派擅长相面的兄长以进谒之名到南京为“委员长”看过一相，回来后算出“蒋某人过不了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关”，于是“机不可失”。谁知仓促起兵后，广东空军竟被蒋介石全面收买，飞机全部北投南京，主力余汉谋的第一军又在中央当局的厚饷引诱下叛陈而去，广东军顿时瓦解。广西孤掌难鸣，只得服从南京政府。到此“南天王”才明白所谓“机不可失”，原来是空军的飞“机”不可“失”。不过陈济棠之兄对年内老蒋会有厄运的相面和掐算倒也未错，6月间发动的“两广事变”虽然被顺利解决，但当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却几乎丧命，的确是差点过不了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关”。

“两广事变”虽败，却反映了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的态度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大失人心，以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军阀也以“抗日”的名义起兵反蒋。可其时蒋介石却未悟出此点，反而得意忘形。国民党代表陈立夫随后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等人的秘密谈判时又马上升高要价，声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①这实际上是要求红军先放下武器缴械受编，随后国民政府才能在政治上允许共产党组织合法活动。

1936年9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迎接。原先蒋介石派驻川陕拦截红军的最精锐的部队，是拥兵30个团、有6万

^① 《潘汉年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2日，引自《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之众的胡宗南第一军。该部在“两广事变”时本已调往湖南，此时蒋介石又将其调回西（安）兰（州）公路，同时又调动原先曾在长城抗战的嫡系关麟征部等，集合了30万重兵，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围剿”。

“蒋委员长”本人则亲临西安督战，并逼迫张、杨的部队也参加进攻。

蒋介石认为这是剿共最后一役，其实，中共中央当时已决定放弃大兵压境且十分贫瘠的陕北，以西路军向黄河以西活动，同时准备以一部出陕南，中共中央率东路军到山西，再进至中原。计划采取四处“长征”的方式，使国民党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迫其最后接受停战。

就在毛泽东准备率部启程东渡黄河的关头，1936年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终于爆发了国民党内部“逼蒋抗日”的事件。此事件发生前中共中央并不知情，在解决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赶到西安面见蒋介石，使这个国民党的最高领导者同意放弃“围剿”政策，中共则提出停止武力反对国民党的保证，这就成为国共两党继十年内战后重新建立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此后，周恩来继续与蒋介石等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此基本形成。尽管国民党从来不承认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不过在日本侵略者继续步步深入的情况下，南京政府也就此结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一味妥协的政策，中国走上了准备全面抗战的道路。



油画《东渡黄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前线充当了抗战的中流砥柱。（李明峰作品）

南京政府表示准备对日抗战，正合乎全国民众当时的一致呼声。谁反对这一点就会被唾骂为汉奸，将与溥仪划为一类，马上会被推倒。于是内地各



省军阀无一例外地都表示服从中央，在军事上接受调遣。连远在新疆的割据者盛世才，也宣布拥护政府抗日。蒋介石正是在“抗日”的旗号下，才在国民党内部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未完成的“政令、军令统一”。

至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十分复杂。虽然内战基本停止，但却留下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政治形式共同抗战，以及红军如何改编这两大项。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开始同顾祝同，后又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反复商讨，却始终在这两大问题上争执不决。

在两党关系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的基本态度是要建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两党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以蒋介石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事事服从于蒋介石，并逐步在组织上予以取消。中国共产党当时作出一定让步，表示同意建立同盟会，并以蒋介石为主席，却要先制定共同纲领，“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原则上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对不符合共同纲领的“最后决定”不能服从。

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党开始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国民党则坚决要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共产党方面让步后，双方又就编多少部队（这主要关系到发多少人的饷）、指挥权和人事问题展开争论。共产党方面开始提出要编4个师（包括河西的西路军）总兵力6万~7万人，国民党开始只同意编3个师3万人，不同意包括西路军。对改编完的红军部队，国民党开始不同意设统一的指挥机构，并要“朱毛出洋”，这完全是以收编战败军阀的态度对待红军。对此，中共方面坚决拒绝，坚持要设统一的指挥机构，朱德、毛泽东不能出国。

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虽有当年参加过共产党、一向主张和共的邵力子，不过有关军事方面谈判的主持人是特务头子康泽。此人早年作为出身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学生代表曾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众多共产党学生包围下就以“反共健将”著称。不过后来证明此人对共产党态度恶劣却并无坚强斗争意志，11年后他在襄阳担任绥靖区司令官时面对冲到碉堡前的解放军，虽抹了一脸的死人血但还是站出来举手投降。在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中，这个康泽多方作梗，最后交给中共的方案是要求改编后的3个师直属国民政府行营，可以再设一个政训处“转达人事、指挥”，可以由周恩来任主



1936年秋，蒋介石（左）到西安督促“剿共”，遭到杨虎杨（前左二）和张学良（前左四）反对，促使了西安事变发生。

任，他自己却要担任副主任，并要向各师派出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副师长和参谋长等大批军官。

毛泽东闻讯后的答复是——“不许入营门一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障党生存的命脉，岂能容许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中来任指挥职务！何况康泽亲自挑选的这批军官大都是特工人员，他们到红军中来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收买和瓦解。

这样，尽管双方确定了可以共同对日作战的意向，但具体的合作方式却谈不拢。国民党要以溶化的方式对待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则坚持保持组织和军队的独立性。谈判就这样一直拖延不决，直至卢沟桥的炮声响起。

卢沟桥炮声解决了双方争执

过去人们常说“抗战八年”，近些年来历史书上又通常写十四年抗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战算起。不过，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毕竟都是局部抗战，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才终于开始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面对中国停止内战开始实现民族团结的新局面，日本人着急起来。其军部内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的强硬派更是加紧活动，1937年6月新成立的近卫内阁大力促成战时体制。同月，关东军首脑也提出应在进攻苏联前“对支一击”，即给中国以打击。既然干柴已备，那么寻找点



燃的火星就顺理成章，任何偶发或有意制造的事端都必然引起一场大战。

此刻出面点火的，正是日本驻在华北的“支那驻屯军”。1937年5月和6月间这支驻军在北平、天津附近不断举行实战演习，并不顾当地中国驻军的抗议，一再进行武装挑衅。

对于“支那驻屯军”一词，若干年来国内有些翻译者按照中国人的意译将其写为“中国驻屯军”，其实这并未表达出日本人当时特定用词的原意。

“支那”一词确实是指中国，但却与“中国”并非一个意思。自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社会上那种“脱亚论”导致的“香蕉帝国主义”也反映在用词上，即在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沿用几十年并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名词——“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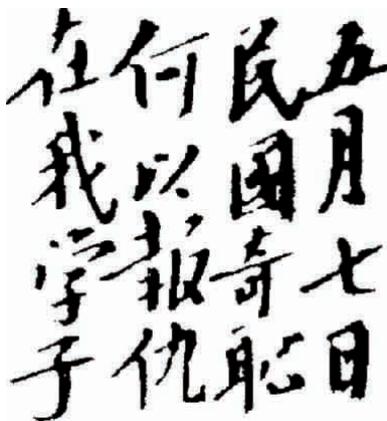
“支那”一词，对于现在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已不熟悉，然而，在中日两国出现悲剧性关系的年代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当时的日本朝野对中国从不以正式的国名相称，而刻意使用“支那”一词，就基本的礼貌而言，如同对人不呼其名而专门称其厌恶的绰号一般。翻阅日本当年的出版物，随处可见“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的称呼。那些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此语，肯定会感到刺耳痛心。日本对中国亡国灭种的威胁，令凡有血性的热血男儿无不激动愤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交企图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正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奋笔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诗句。随后毛泽东还称，二十年后中日总要一战，才能解决问题。

果然，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联合起来，率领几十年来



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不承认对华开战，出动大军进攻只称是“支那事变”。



1915年毛泽东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愤怒写下的四言诗。

积愤在胸的几亿中国人奋起对日抗战。

在世界史上，一国对另一国发起侵略战争，一般都从国境开始。可是，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地点卢沟桥，却在中国腹地的故都城郊。只此一点，就说明日本早通过以往的一系列入侵深入我国国土纵深，已经扼住了咽喉要道，中国人实在是退无可退，再不抗战实在不足以图存！

卢沟桥在北京城西南10余公里，是北平城向南通过永定河上的重要交通要道，由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驻守。1937年7月7日晚间，驻在北京西南丰台镇的日军一个中队，在紧靠着中国第二十九军驻地的卢沟桥边的龙王庙举行夜间实兵演习，随即向驻守在宛平县城的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开炮并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进行了还击。



国民党方面表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绘画。



1937年8月8日，日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对于日本军队在卢沟桥边的进攻，战时和战后日本国内都有人称其为“偶发”事件，否认日军有意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然而，即使从日军当时的记录和挑起事变的所谓“理由”看，其辩解的借口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日军挑起这一事件，并向中国军队进攻的借口有两个：一是遇到“非法射击”，二是一名士兵“行方不明”。据事后“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述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深夜所遇到的所谓“射击”，也只是听到枪声，不仅没有伤亡，连子弹从哪里飞来都无确切根据。至于一名士兵“行方不明”，日军后来也说明此人很快就已经归队，失踪原因是去附近田地里大便。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却在接到“失踪”士兵已归队的报告，并且双方已经派员开始交涉后仍下令攻击，这只能解释为故意挑起事端，为向



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寻找借口。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形势演变也说明，日本政府虽然一度提出过所谓“不扩大方针”，实际上日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却天天在扩大。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7月8日5时中日两军发生战斗后，当天上午关东军司令部即在植田谦吉司令官的主持下开会，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对冀察予以一击”^①。

对于卢沟桥事变，东京的陆军部内曾有过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乘这一时机打击中国以贯彻在华北建立“第二满洲国”的政策，被称为“对支一击论”，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次官等都强调这种主张。当时强硬派的代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后来升为中将，是战后东京审判中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叫嚷：“不只是对支膺惩，还应认为这是实现将北支那作为满洲国缓冲地带的希望。”

与此相对立的，是以参谋次长多田骏、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一派提出的“慎重论”，亦称“不扩大论”。他们认为如果派兵会引起长期战争，因而主张避免开战而专心于对苏联加强战备。这批人实际上也是侵华老手，那个石原莞尔更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之一，他们只是主张缓进蚕食而已。

在日本军部内，主张迅速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的一派占有绝对优势，这时日本的大财阀们又大多赞成趁这一时机对中国实施打击，以武力确保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于是在政界就出现了被称之为“军财抱合”的体制。

7月11日，在卢沟桥附近作战的日本支那驻屯军已经与中国第二十九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两军正式停火。可是，同日近卫首相与内阁的外、陆、海、藏相举行五相会议，会上一致认为现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即使达成协议也要废弃，并同意参谋本部的出兵计划。当天近卫首相又将上述决定上奏天皇裁可。此后的谈判交涉，其实都只不过是争取时间、麻痹对手的缓兵之计。

当时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当局仍然抱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7月18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到天津访问了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表示遗憾，承认了驻屯军提出的“关于取缔中共及排日运动等有关条件”。不过此时日军仍然加紧增兵，大规模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① 日本防卫厅编：《北支の治安战》。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各界发出进行抗战的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7月8日向全国发表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即准备应付大的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尽管这时国共两党谈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但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上的争论尚无最后结果，于是，7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自行改编，等候出动。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鉴于日军压境，也感到无法再行退让，在继续对日交涉的同时公开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调动了部分军队北上，支援在北平、天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

7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避暑地、被称为“夏都”的庐山发表了谈话，其结语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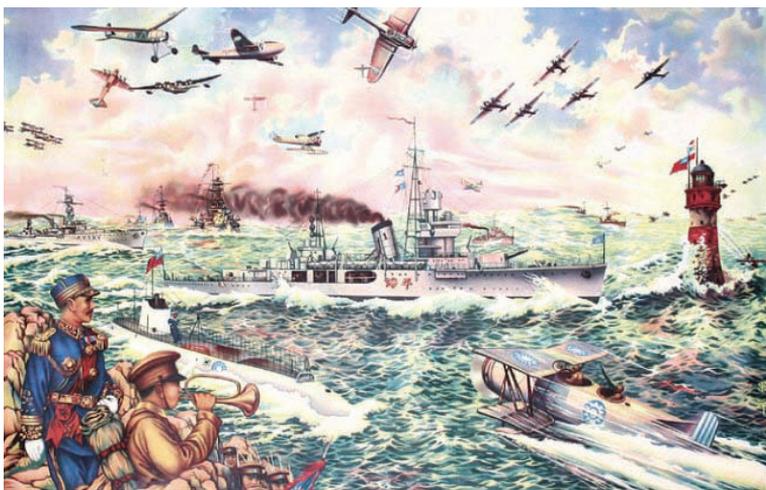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次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政策。蒋介石的这几句话，也为国人传扬一时，成为人皆耳熟能详之词。此后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共产党则回答，蒋氏本人不是也讲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敌后发动民众，建立武装呢？

在蒋介石发表那篇著名的“庐山讲话”的同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也上了山，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表示坚决支持。接着，日军于7月28日占领北平，7月30日占领天津。日本人对华北的大举进攻，终于使南京政府改变了前一阶段的犹豫态度。

8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委员长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中央政府及各地军政首脑都出席了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参加。毛泽东没有去南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前往参加会议。

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说：“目前冀察问题不可能局部解决。如果以长城划疆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行为，这我敢做。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实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我们的国家不抗战就要灭亡。”



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发出《海陆空军抗敌出师图》宣传画，事实上中国军队远没有画中那样装备精良。

这番话虽然暴露了国民党当局抗战的不彻底性，即只想以长城为界，实际默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不过毕竟宣布要实行抗战，这比起过去的不抵抗和节节退让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为制止日军继续向华北深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中旬调整了防御部署，以北平以北的南口和保定以北这两个方向为防御重点，增调部队，并确定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的方式，逐次消耗敌人，以求争取时间。同时，蒋介石还以全国拥护的最高统帅地位，要求各省部队和红军都出动到抗日前线。在举国“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抗日呼声中，原先划地自守的各个军阀差不多都表示要派兵到抗日前线，远在深远后方的四川各军阀也都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既然各省都表态要服从中央抗日，蒋介石也有了摆布和收拾他们的理由。例如四川在抗战前由十几个军阀各自割据，这些大都出身于绿林并靠拖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们，互相抢夺地盘，年年内战不已。征战之际，军阀们刮地皮也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为了养兵和自肥，设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即使如此还不满足，通常还要预收粮税。在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的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四川许多县份的粮税已经预征到了1961年！如此这般，搞得这个天府之国四野民穷财尽。与此同时，这些各霸一方的土皇帝们，却个个田连阡陌，甲第连云，妻妾成群。像大邑县那个驰名全国的地主庄园，就是刘文彩依仗他军阀兄弟刘文辉的势力，在短短几年内靠搜刮民财

建立起来的。他们称雄割据，只是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并不许中央军入境一步。

军阀统治下“富者田亩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强烈对比，当年自然激起剧烈地反抗和社会动荡。民国之后四川民变不断，1932年红军第四方面军遭国民党中央军“围剿”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西进后，仅仅有1万多人进入川东北。入川后红军宣传队员们登高振臂一呼，衣衫褴褛的穷苦人顿时应者云集，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到了8万余人。四川军阀们无法对付，只好请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从陕西入川，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也跟着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从后面追击，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从南面进入了这块长年对外封闭的内陆盆地。

“请神容易送神难。”虽然红军被打走了，但国民党中央势力却顺势控制了四川，并强迫各路川军“整编”。这些长期称霸当地的土皇帝、地头蛇尽管内心不满，可想到蒋介石毕竟与共产党、红军不同，不会“共”他们的产，自己搜刮民脂民膏设办的田地、建起的公馆和娶纳的妻妾还能保留如故，也就兵不血刃地乖乖服从了。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那些平日“格老子”“龟儿子”不离口的川军军长、师长集合起自己的“双枪兵”，先是狠狠地吸上一口烟，然后咳嗽一声说道：

“弟兄们都给老子好好听着：格老子来了命令。从今天起，我们就听老蒋的、听中央的了！哪个不服从就是龟儿子！”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一致抗战的气氛下川军也大都上了前线。首批部队奉调增援山西后，当地的土皇帝阎锡山就骂这些部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四川军阀部队的素质确是糟不可言，不过广大军民出于保卫祖国的同仇敌忾，仍有过慷慨悲歌上战场的一幕。卢沟桥和上海的炮声一响起，远在内陆的四川民众也群情激奋动员和欢送各派川军上前线。各界代表在会上表示，过去在内战中相互厮杀毫无意义，如今与侵略祖国的民族敌人相拼才是为国为民尽力。不少人还以诸葛武侯率蜀汉大军出征的事例相激励，那些衣衫单薄的士兵首次在民众的夹道欢呼声中走向了华北、华中战场。川军也有许多部队基于民族大义，与日军浴血拼杀。在台儿庄附近的滕县战斗中，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全师坚守孤城三日，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写下抗战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不过，蒋介石调川军出老巢，“醉翁之意”却不在军事方面。一方面，蒋介石借口前线兵力不足，将战斗力不强的川军除西康的刘文辉部外几乎都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实力雄厚的中央军



却源源开入了后方四川。当地那些老军阀除了在公馆里、茶馆里摆龙门阵逞点威风外，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完全成了中央系统的天下。

蒋介石不仅对待川军如此，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将桂军开赴华中抗日战场后，中央系也接受了广西省政。此后，中央军又以抗战之名开进云南，甚至在盛世才反共后还“西出阳关”开入新疆。这样，除了沦陷区、西藏和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外，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完成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控制。

尽管蒋介石确定对日作战含有私心自用的目的，不过采取对日抵抗方针还顺乎了全国民意。当时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甚至包括各主要军阀一致参加抗战，这一情况完全出乎日本军阀的意料。日本陆相杉山元在主张“对支一击”时，认为一个月就可解决“支那事变”。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的军官们甚至叫嚣：“只要内地有动员的声音或运兵车通过山海关，支那方面就会屈服。”然而，他们遇到的是中国人民不屈服的意志和顽强的抵抗。正如一年后武汉国民参政会召开时一名年纪最大的参政员所说，7月7日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意义比“双十”节还要大。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对日本不再退让了，而是开始了挺身抵抗！

华北抗战开始后，上海方面又很快进行了“八一三”抗战。中国从南到北都卷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中。对于上海战事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也曾有过探讨。不过严格来讲，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这些细枝末节并不重要。日本进攻上海早在预定的计划之中，在华北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于7月29日拟订的作战计划规定：“击败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确保该地的稳定，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在保定、独流镇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当时，日本政府已命令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日本侨民撤回回国，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及武装日侨组成的“上海商团”都进行了临战动员。随后，出现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强行闯进中国保安队守卫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日本政府以8月9日闯虹桥机场的两个日本军人被击毙一事为借口，10日在内阁会议上即决定向上海出兵两个师团。当时中国没有正规军在上海，为应付紧急情况并争取主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德式装备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穿上保安队的服装，于8月11日进驻上海，并以海军封锁长江口。在这种双方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8月13日张治中率领的入沪部队在日租界附近修筑工事时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交火，著名的“八一三”抗战开始。

上海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随即投入了南京政府的多数精锐部队，固然体现了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实际上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国际干涉的幻想。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此分析说：

“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抽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力干涉。”^①

西方人确实曾出面干涉，8月中旬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使战火扩大到上海，并出面调解，可是日本根本不予理睬。70年前想“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此时自感羽翼已丰，对欧美人也不买账。蒋介石孤注一掷迅速求和的幻想就此破灭，日本人的速胜梦也未做成，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预见的持久战局面随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由于日本人打上门来，长期拖延不决的国共谈判也有了结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到红军改编问题时态度有很大让步，设立统一指挥机构得到同意，国民党可不派指挥人员而只在各师设联络参谋。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可以再编一个军。总之，这时蒋介石急于把共产党和红军调上前线去打仗，至于诸多的麻烦事，他认为可以由日本人来解决。

8月1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同时，南京政府也公开表示了与苏联合作的态度，于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宣布接受苏联援助。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其实，这种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分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又开始了“八一三”抗战，这是当时的宣传画。

^①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十章之（五）。



明是表示说：你若再逼我，那我就要赤化了！

军事问题虽勉强达成协议，但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问题却没有解决。

戴国民党军帽的不平等合作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的炮声使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一致对日作战，然而，合作的形式却是极其特殊和很不平等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宣布实现了国共合作，以后在史书上也一直如此说。可是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讲话，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却从来没有用过“国共合作”一词。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于7月14日上庐山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交给蒋介石，希望能够发表。蒋介石开始还提笔改了两个句子，随后却又压下不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以政府名义发表中共这样的文件等于承认了国共合作这一概念。

周恩来后来对蒋介石这一心理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可谓入木三分：

“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改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①

此后，蒋介石又坚持当初停止剿共时的态度，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讲什么“允许共党输诚”。李宗仁也只是到1949年年初向中国共产党求和时才公开讲什么希望“国共合作”，不过到此时如此说只能使人一笑。

国民党首领的这种态度也并非偶然，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从来就是不平等的。严格而论，当年孙中山也没有用过“联共”一词，只是用“容共”一词，因为在他看来，有党员数十万的国民党只能与苏俄这个大国联合，对只有几百人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容纳”其加入以补充新鲜血液。孙中山去世后，左派人士和鲍罗庭等对这位领袖当年的做法加以总结，从而概括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蒋介石对共产党也只讲到“容”，后来又加了三点水变成“溶”，这倒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内在用意。

按照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发布《八一宣言》时的打算，是准备与国民党

^①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

和其他党派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红军参加抗日联军。可是这一打算未能实现，关键在于实力相差悬殊。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曾计划以西北的8万红军再联合17万东北军、4万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控制大西北，背靠苏联，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得到武器和物资援助，这样共产党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发言权就大不一样。可是由于两件事出了差错使这一计划流产：一是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出并控制，二是红军西路军覆没于河西走廊。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未听周恩来之言，送蒋介石回南京请罪，结果被扣留不得返。东北军群龙无首，加上其底子是由张作霖的胡匪队伍演变而成，素质很差，经不起蒋介石的威胁和特务的收买拉拢。1937年2月初，东北军因无人能控制而出现少壮派发起的“二二事变”内讧，国民党中央军乘机进兵西安，东北军面临着东调安徽和西去甘肃两种选择。此时军中多数将领不愿西去贫困的甘肃，只要蒋介石能给他们发饷就愿意东出潼关，于是不再与红军联合而听命开拔，此后被蒋介石分散调配，整个东北军系统就此瓦解。

东北军一走，杨虎城的西北军孤掌难鸣。他本人听命出洋，部队也被蒋介石收编。等到抗战开始后杨虎城从美国回来，未赶到原部队就落入戴笠的特务之手。据说蒋介石对张、杨二人是名副其实的恨之入骨，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爬墙逃跑时摔伤了腰，只要天阴时感到骨髓疼痛，马上就会想到张、杨二人。1949年9月，蒋介石到重庆应付残局时，特务头子毛人凤询问是否再把杨虎城转到台湾关押，这位当时名义上已经下野的“总统”恨恨地说：“若不是他和张学良作乱，共产党早叫我消灭了，哪里会有今天？搞掉算了。”再问一同关押的幼子、幼女如何处理时，蒋介石也恼怒地回答说：“还留着干什么？”结果几天后，杨虎城及其子女就在戴公祠被军统特务手刃。此事既显示了蒋氏之残暴，也说明其对杨虎城衔恨之深。据说张学良掌握着蒋介石的一些秘密并由其亲属放在美国的保险柜中，所以虽被长期监禁却留得一命。

原先与红军合作的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被调走和改编，“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局面瓦解。1937年3月，红军的西路军又在甘肃河西走廊被马家军消灭，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并得到武器物资援助的希望也落空。红军实力削弱，谈判中的地位自然要降低。

当时贫瘠的陕甘宁边区没有外援，停止对国民党的内战后又不能再打土豪，因此很难养活许多人员，于是不得不向国民党方面要求发饷，经济上的困难自然影响到政治发言权。西路军失败后，西北红军虽扩充了些人员，



然而将所有脱产人员包括延安的学生和医院里的残废军人都算上，总数也只有7.4万人，其中总部机关4000人，野战军4.2万人。而国民党政府有170万军队，其中虽多半是各省地方军，但中央军却也有60个师80万人之众，双方的实力不成比例，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根本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

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的红军改编，共产党在形式上所做的让步就只能更大一些。在国民党保证发饷并不加吞并的前提下，红军名义上要编入“国军”中去。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就说过：“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①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干部战士最感痛苦的就是摘下代表“五大洲”即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过去长年作为瞄准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军帽。而且认真追溯起来，这种后来人们在电影上看惯了的路建军、新四军的帽子（其实是国民党的军帽）式样，原出自德军。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面学习纳粹德国，连服装也加以仿照，向当时的全部“国军”推广了这种仿德式军帽。红军整编时，许多人在举行仪式并换帽子这一天都放声大哭，有些人索性说：“我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戴青天白日帽子。”

作为一种暂时的忍让，八路军、新四军的首长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全军干部战士忍痛戴上国民党军帽。毛泽东本人却从来不戴这种帽子，出席党内会议仍然头顶八角帽，只是上面不再缀红星，其寓意是同志们一看即明的。其实，以后八路军官兵除了在“统战场合”即与国民党军会面之外，平时的军帽上也不缀上内心憎恶的青天白日徽，领子上也不佩国民党授予的军衔章。到了皖南事变发生，留下的这种军徽都在激愤中被砸碎，此后多年人们看到的共产党军队是一支军帽上没有军徽的队伍。

虽然有强迫戴国民党军帽并编入其序列的不平等形式，不过南京政府同意停止内战（不过蒋介石从不用“内战”一词，只称“剿匪”或“讨逆”），吸收红军参加共同对日作战，这在事实上是同共产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以妄自尊大的态度居于国内各党派之上，不肯用“合作”之类的名词。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国共之间的关系长期在政治上没有明确定义，处于一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种严格来讲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之中。

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打交道时总以“政府”和“中央”自居，而不是以党的身份出面。而在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历史书上，“国民党政府”和“国民政府”这两个词一般是混用的，而且基本用前一个名词，这也符合实情，因为国民政府是完全由国民党一党掌握的政府。按照孙中山早年所制定的建国大纲，就是以党治国，不过他临终前主张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民会议，表现出其思想已开始有所改变。然而，孙中山的不肖门徒们后来为实行一党专制，死抱着建国大纲不放。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直至1946年秋召开伪国民大会粉饰性地拉来青年党、国社党入阁作为陪衬为止，国民政府在二十多年里一直按照由国民党先行“军政”、再行“训政”的原则，所有政府成员的人选和施政方式都由国民党中央决定，甚至非国民党员者不能在政府当官。国民党“党歌”，即“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还被法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歌”。（一党的党歌与国歌混同，除国民党外世界上还有苏联一度采用的《国际歌》也是如此。）所谓“党国”者，名副其实是国民党与国家政府混为一体，党的“总裁”（为避孙中山“总理”职务之讳而设此称，后蒋经国继职后又避其父职之讳改称“主席”）蒋介石又按封建会党传统和兼收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组织形式，掌握一切决定权，于是变成“朕即国家”，在西方人眼中也是标准的独裁政体。

可惜国民党的统治虽有独裁的恶例，却无独裁的效率，虽不承认其他党派又没本事将其吞并。尤其是对于共产党，十年也未“剿”灭，此时只好再“容”，却又不能认可其合法地位。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表观点的合法场所，只有1938年才设立的国民参政会。毛泽东、周恩来、王明等都是被国民党当局指定（注意：不是选举）的参政员。这个参政会不同于西方有立法权的议会，唯一的权利是向政府提出建议以备“咨询”，只起个粉饰独裁专制的花瓶作用。尤其可笑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愿承认共产党组织和其他党派在政治上的地位，更不愿承认中共军队的独立性，因此邀请中共人员加入国民参政会时，只承认其是“文化团体”的个人代表而非党派代表，其依据又是参政会条例中“曾在重要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的规定。

对此，毛泽东曾以嘲笑的口吻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我们是‘武化团体’。”^①恰恰是由于有军队这一点，蒋介石对这个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恨之入骨、一直不愿正式承认的“文化团体”却又不得不在对日作战中加以利用。就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周恩来所概括的“默认中形成”“习惯中发展”并充满矛盾的合作关系。

总之，假如抛开对外发表宣言或谈判时冠冕堂皇的语言，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就是仿照过去封建王朝的做法，即采取“招安”的态度。国民党当局用收编军阀的态度对待红军，想以给番号和发一点军饷的办法，把八路军、新四军推向抗日第一线，此后又赞成共产党到日军后方发展，其目的都是想让日本的飞机大炮来消灭自己经过十年内战都没有消灭的对手。

对于共产党之外的国内其他军阀，蒋介石用的也是这一套。抗战开始后，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粤军等“杂牌”武装都被中央系统以“抗日”之名推到最前线，一般又在中央嫡系的监视下担任最危险的任务。这些军阀都知道蒋介石是借外战之机消灭异己，因此大都竭力避免打硬仗，想方设法保存实力。然而有韩复榘临阵脱逃被处决的前例，加上抗战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还不能不打一些拼消耗的恶仗。结果这些杂牌军受到损失后国民党中央一向极少补充，一些损失重大的部队还被中央军借整编之名兼并了。到了抗战后期，以黄埔军为基础扩建的中央军的番号数量较之抗战开始时增加了1.5倍，较之北伐开始时更增加了20倍，达到140个师，而且各师人数和武器装备又远胜于杂牌军。此时各地方军阀部队不仅实力日削，番号数也有所减少，如此蒋介石还不满意。据《李宗仁回忆录》称，临近胜利时蒋介石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要全国军队的番号名册，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非黄埔中央系的军队还有近140个师，于是大为不悦地说：“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许多番号？”

这显然是埋怨对杂牌军太宽容姑息了。于是陈诚马上起来攻击他的对手何应钦，声称若是我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早就把他们消灭光了！蒋介石马上解除了何应钦担任了十几年的军政部部长之职，由陈诚代之。其实何应钦的失宠也有点冤枉，他对消灭异己已经尽了大力。多数杂牌军虽然番号还存在，但其内部多已被中央军派出的军官（如副职、参谋长大都由中央委派）控制，并受到军统特务渗透，已经不能不事事服从蒋介石了。国民党内部的“军令政令统一”，除了云南省一个倔强不听命的军阀龙云外，基本已经完成。

蒋介石虽然成功地对付了其他军阀，但对共产党采取这一套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到了抗日前线，却根据毛泽东的英明决断，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在国民党抛弃的大片地区内建立起根据地。结果，八路

军、新四军挺进有了十几倍、几十倍的发展，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建立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使国民党头目们气得搓手顿足、徒呼奈何！

洛川一 would 定方向

1937年8月，华北、上海两地开始全面抗战后，拖延未决的国共谈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红军改编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发展方向问题。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名义上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提出对日作战号召的团体，开赴抗日前线是毫无疑问的。此时的问题在于应出多少兵、向什么地方发展及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总的目标是要达到既要避免遭借刀杀人的毒计，又要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自己。

在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也关系到国共双方多年角逐成败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显现出他在全党过人的高超之处。早在国共实现合作前一年即1936年夏，他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曾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前景做过一番预测，斯诺对此回忆说：

“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力量荡尽以后，红军的力量就迅速壮大起来了。”

“主席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我都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研究载于我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译按：即《西行漫记》）一书中纲领的人，都可以看出，当日本人把国民党和西方国家从中国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从而留下一种政治真空时，共产党人是多么愿意奔赴广大的内地，并把农民组织起来。”^①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爆发一年前就预想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后就向日军后方的“政治真空”地带发展。国民党当局要红军前出抗日前线时，在作战任务的安排上却想划分一段正面战线让共产党的军队承担。毛泽东则向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向国民党要求“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

^①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3~74页。



主的指挥权”^①。

根据毛泽东提出并明确向蒋介石说明的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战略方向上接受国民党的要求，不能接受具体的战役指挥和正面战场的一段战线，而要向敌后进发，由自己在战略上独自担负作战任务。例如，当时中共中央同意接受在山西东北部这一方向作战的任务，具体作战方式则无须国民党方面指挥和过问。当时蒋介石急于要红军开赴战场并想借刀杀人，对此问题在原则上予以同意。

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中部的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而不在延安开会，是因为当时正等待改编的红军大都集中在较富庶的陕西中部（陕北缺粮养不起大军），高级将领们参加会议方便。

在中共中央的洛川会议上，到会者曾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战略转变时期，党内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其实属于正常现象，不能像后来动輒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在会上根据红军的特长及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作战地区主要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交界。这样，就确定了两项最重要的原则：

一是独立自主，即如毛泽东随后所解释的那样，“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这样就能粉碎国民党的吞并和借刀杀人的阴谋。

二是山地游击战，并以日本占领区为作战方向，同时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②。这样就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并在长期的战争中积蓄和发展力量。

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不过有些党内领导者习惯于过去长期与国民党军打惯了的运动战，因此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

“运动”这二字放在前面，内容就有很大不同，这实际上是还想同强大的日本军队打大仗，未充分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意义。以后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无比高超。

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3个师，人数编制为4.5万人，国民党当局照此数发饷发服装。其实，当时在陕北的红军野战部队共有八路军4.2万人，其他编余人员一部分改为地方武装，一部分作为补充兵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油画《黄崖洞保卫战》描绘了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奋战的场面。（李明峰作品）

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后，即开赴抗日前线，不过在出师路线上也颇费了一番考虑。当时国民党当局想在出发路线上做文章，将原红军分割使用。为此，蒋介石让中央系统的人躲在幕后，让两个身为杂牌的桂系将领出面，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军委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向八路军下达命令，要求以两个师从陕西渭南上火车，经同蒲铁路到山西北部代县下车参战；以一个师经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在河北徐水下车，到冀东开展游击战。

对此，毛泽东和张闻天马上复电在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为防止国民党暗算，中共中央决定“谢绝”国民党军委会的“好意”，不乘车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而是徒步由陕甘宁边区东面的韩城渡口过黄河，进入当时与中共统战关系较好的山西境内。因为一旦坐上火车，别人把你向哪里拉就可能身不由己了，还不如自己的两条脚走偏僻的道路可靠。

在出兵数量上，国民党原要求八路军全部出动。考虑到当时中共唯一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和其他因素，开始毛泽东提议先出三分之一，后来经考虑认为多出有利，决定出师3.2万人。毛泽东又强调，“红军全部开出是蒋之要求”“蒋在陕甘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出去，他则稳占此后方”^①。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陕甘宁边区仍留1个旅部和9000人的正规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守卫边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9月23日，因国民政府统一调整了全国战区和作战部队番号，八路军按照抗日作战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由山西老军阀阎锡山担任，负责晋绥地区的作战。此后，朱德的正式官衔也由“总指挥”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这个番号其实仅仅得到一个月后就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换，可是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对外仍称八路军，只是对国民党当局上报文件时用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后来所称的“八路军总司令”一衔并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表，因为八路军只有“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才有“总司令”官衔。

当时中共中央要求不改称呼是出于政治考虑，包含着与国民党斗争的寓意。因为“集团军”是战争中的临时作战序列，可以随时更改，国民党政权日后能够据此取消共产党军队的公开名目；某军、某路军则是比较固定的编制，不易取消。何况当时“八路军”一词已经在华北叫响，好记好称，从群众影响着想也不便随便改动。结果，八路军这一番号尽管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表上早已不存在，却在以后一直叫了多年，威名震天下，影响远及国统区、日本统治区和世界各国。严格来讲，此称呼已经由序数词异化为名词，变成中国革命军队的代称。直至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根据地军民还习惯性地称人民解放军为“八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长期如此。国民党刚刚逃往台湾后，台湾的公共汽车、电车的号序中居然都取消了第8路，因为乘车者在站台一听到“八路来了”就心惊肉跳。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时，对面南朝鲜军的上层军官因多数毕业于日本和伪满的军校，过去对中共军队也习惯称“共产军”和“八路”，因此当时韩国报纸上报道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消息时，用语是“发现对面之敌已非北傀部队，而是八路军”。

这一日后“威名天下扬”的八路军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北部，正值日军长驱直入雁北。9月下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平型关方向时，经华北军分会负责政治决策的任弼时当机立断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此为当时按国民革命军编制的对外称呼，实际上聂荣臻为政委）的指挥下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和补给部队。平型关战斗发起前，原定由八路军与国民党晋绥军共同进行这一战斗。由于国民党军消极作战，未能及时出击，战斗任务主要由八路军担负，因而未能对日军达成歼灭，影响了预定作战任务的完成。此次战斗，八路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军大衣1万多件，以及其他军用品。

八路军出师后首战平型关取得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



油画《激流——八路军一一五师奔赴平型关》。（张庆涛作品）

党的影响，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意志。不过平型关战斗的规模不大，在战略全局上尚不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这一仗的实践，八路军也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战斗力远远高于国内战场上以往对手的日本军队。那些深受武士道灌输的东洋兵战斗极为顽强，在战场上虽想活捉敌人，但无一降者，双方的伤兵都扭在一起相互咬打。平型关一仗中八路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形，又采取突然袭击，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仍与日军基本相等，而且损失的大都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国民党当局虽然对八路军予以嘉奖，但却基本上不给武器弹药方面的补充，继续打这样的硬仗或打大的运动战对八路军是不利的。

此时，毛泽东从敌我友三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强调八路军应坚持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①

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一面仍以一部分兵力以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一面分兵发动群众，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形成全面展开的局势。

在晋东北方向，在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只以2000人的兵力开展游击战，就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了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并有最好的发展条件。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已经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形成几不管的空白地区，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所到之处，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就有无数人响应。一个排、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而且利用搜集到的国民党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能很快扩大部队。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动员各阶层参军也远比土地革命时期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几个月里就扩大到4万人。当时连五台山的年轻和尚都有几千人入伍，这



毛泽东同延安农民在一起聊天，党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共产党人力量之所在。

固然与战乱中香火布施断绝而难以再享供养有关，民族大义的动员也是基本原因。当时和尚们参军的口号就是——“我们虽然出了家，可还没有出国！”

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确定的向敌后发展方针的正确性，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晋察冀边区也给全国解放区树立了榜样。毛泽东以后也盛赞道：过去有个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如今是聂荣臻大闹五台山，聂荣臻可比鲁智深厉害多了！

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同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以后，活动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并进逼大同，发展了晋北游击战争，随后创建了晋绥根据地。不过，因这一地区太穷困，兵源财源均缺乏，一二〇师主力以后又向东和向北发展。

平型关大战后，一一五师主力因伤亡较大，撤到晋西南休整补充，随后又在那里建立了吕梁根据地，并背靠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八路军前方部队与总后方的战略通道。

1937年年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山西东南，在太行山南部建立根据地，一曲《在太行山上》从此响彻大地。通过发动群众和向周围发展，这块根据地很快纵跨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毛泽东于11月12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①此时，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随后依托各根据地广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油画名作《巍巍太行》表现了八路军领导人在太行山区领导建立根据地的情景。（张文新作品）

开展了敌后游击战，日军虽然深入了华北，然而他们的后方却变成新的前线，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了新的广阔空间驰骋纵横。

是否建立新四军之争

当华北和上海方面抗日的战火燃起之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经过艰难的谈判才得到解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这八个省内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正像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绘的，每天差不多都在山林中过着“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的日子。许多人都说，长征苦，可是也比不了三年游击战争苦啊！后来在党史研究中，一般也都认为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联在密林中的奋战这三项斗争为艰苦之最。

南方游击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恰恰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北地区的内战基本平息之后的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谈判红军改编，一面却命令限期“剿灭”南方“残匪”。他见周恩来时根本回避谈及南方游击队，只想早日造成那里的红军余部已不存在的既成事实，免得在西北的红军改编后再出现一个南方红军的改编问题。此时中共中央与南方各游击队早已失去了联系，对那儿的情况也不了解，只得秘密派人去寻找联络。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搜剿”“清剿”一直持续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



因对日作战急需，在南方各省的部队不得不大都撤到交通要道集中准备上前线。如江西省只剩下8个保安团，国民党省党部被迫派人上山找游击队宣布要“停战议和”。这时中共中央也派人与三年来一直隐蔽在赣粤边山林中的项英、陈毅等人取得联系，他们当即根据中央决定，说服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要他们停止与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改编。

1937年9月，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关于南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项英也下山到达南昌，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对处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见，如同毛泽东、张闻天在9月30日致秦、叶的电报所指出的“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一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①。对原游击根据地不准备轻易放弃，因为那是经过十年苦战留在南方的重要“战略基点”，无论是对付日军入侵华南还是准备对付国民党再发动反共战争，这些基点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国民党当局开始却准备利用“停战议和”将这些游击队吞并，不准在南方再编一个“第二八路军”。后来见前线形势不利及国内抗战的气氛高涨，虽允许中共在南方再编一个军，却要求在部队中安插国民党方面的副职，并将各地的南方游击队全部集中开到抗日前线，各地只许设三几人的留守处以交涉保护家属等事宜，再留武装就要当“土匪”对待。

当时湘鄂赣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毛泽东与张闻天马上致电要求改正，并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由于国共双方谈判中的意见分歧迟迟不能解决，加上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和共产党游击队集中也有困难，新四军成立拖延了很长时间。特别是这一期间国民党福建当局制造的“何鸣事件”，给游击队集中造成很大困难。

这一事件的主角何鸣本人在1937年夏天停战时是中共闽粤边代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指挥着当地近千人的游击队。得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并接到国民党方面议和并改编部队的要求后，他没有听从南方委员会发出的“就地谈判，不能离开根据地”的指示，而是命令各游击队下山集中到闽南的漳浦县城。7月16日，国民党军粤军以集中点名发饷的骗术将游击队员全部集中到县城内的大操场，然后以重兵突然包围上来，将游击队全部缴械。国民党军随后对何鸣等干部加以看管并强行将其编入自己的部队，游击队员则被遣散，一片重要的游击区域和武装力量就此全部毁于一旦。

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党的领导人马上向国民党方面提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油画《东进，东进》表现了陈毅为新四军撰写军歌的场面。

抗议和交涉，国民党福建当局有意编造所谓何部“不服从指挥，行动越轨”的借口，经斗争后才归还了部分人枪。何鸣本人当时被编入国民党军当了一个师政训处的上尉附员，半年后得到党组织要其归队的通知后，又去找新四军军部。到军部后安排工作不久，有人揭发他是“内奸”，因当时在复杂战争环境中难以认真调查，加上出身南方游击队的新四军领导人对何鸣造成的损失又很愤慨，结果由军法处将其处决。事后看来，说何鸣是“内奸”缺乏证据。假如他在游击队集中前真与国民党有勾结，那么在导致震惊全国的事件发生并必然引起组织怀疑和不满后，接到党的通知后岂敢归队呢？何鸣本人确有严重错误，可是被处决应属冤案。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讲到这一事件，评介只是“何鸣同志对蒋介石的阴谋没有警惕”^①，这实际上是在政治上为他平了反。

“何鸣事件”的发生，自然使其他各部游击队的下山集中格外谨慎。另外，许多游击队的领导人三年多在与世隔绝的山间，根本不知道外界的形势变化，听到讲下山接受改编就认为是“叛徒”说降，结果分头上山进行说服工作的人危险性很大，如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等都被拒不听令的游击队杀掉。陈毅到湘赣边游击队进行说服时，也被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下令捆起来，差点砍了脑壳。后来经陈毅反复做工作，谭余保才搞通了思想，接受了党的指示率部下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至1938年1月才陆续有5000余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页。



名游击队队员下山，再由地方党组织临时补充了部分人员，最后集合了1万人。国民党当局给了该部“新编第四军”番号，并要其全部集中开赴长江沿岸的抗战前线。

由于南方游击队的特殊情况，国共双方为达成协议都做了让步。国民党同意编一个军，不向军内派副职，共产党方面则同意全部人员集中开走，南方各地的原游击区只设留守处（实际上秘密留下部分隐蔽的武装人员）。新四军军长的人选，也由国共双方找一个都能接受的非共产党员担任。原先的北伐名将、中共军事工作的创始人叶挺这时由海外归来，虽然他在广州起义后脱党，但这时他仍表示愿意服从党的领导。蒋介石知道他已非共产党员，也想拉拢他。于是双方谈妥以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军部由南昌开赴皖南组织当地敌后的游击战。

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时，样子与西北的正规红军不同。由于三年多在山林中分散游击，人员既缺乏组织，差不多又都没有军装，武器更为破烂，轻机枪都没有几挺。因此，延安方面派来一批军事干部，由袁国平、周子昆等率领，前来加强部队的纪律整顿和作风训练。项英这时又希望从国民党方面得到些武器弹药的补充，因此部队迟迟未开拔。国民党方面则声称八路军曾多报人数，吸取教训后对新四军不逐人、逐枪点验就不能发饷和补充武器弹药，甚至称“新四军任务是打游击，不需要军衣”，迟迟不发给服装。结果点验一拖再拖，最后虽发了军装和低额的军饷，却未补充武器，只象征性地给了极少量的子弹。

1938年1月新四军组成，由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直至3月间才东进到达皖南，5月间先遣队才进入江苏南部。在1937年年末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败，武器弹药丢得到处都是，如果那时抓住良机进入这一带，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可是当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场时，蒋介石吸取在华北的教训，已经让康泽指挥别动队，并组织一些“忠义救国军”式的武装在各地抢先一步，搜集了大量失散武器并收编了民间诸如“胡传魁”式的土匪队伍，新四军已经不能像八路军那样在敌后抢到“先入为主”之利。



新四军军长叶挺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长久受到纪念。这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时发行的纪念邮票。

后来新四军有人抱怨，在后方等了两个月才补充了那么点经费和子弹，假如早到江南就可以自己搜集到几十倍于此的经费和弹药。项英虽然到延安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可他对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精神不理解，在抗战开始后就受制于国民党，结果自出师起就陷入被动状态。

新四军进入抗日前线时，面对的战略形势和地理特点也很不利。日军在华中的占领区主要在长江两岸，地域较狭窄，其两面都是国民党军。新四军进入抗战前线时间已经较晚，加上担负实际领导的副军长项英以后又一直不敢放手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情况更显得困难。新四军主力在皖南和苏南都编入以顾祝同为司令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序列内，各被划定了一块正面不过百里



新四军组建时的领导人，左起陈毅、项英、袁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叶挺。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



的作战区域，面向回旋余地不大的日军占领区，背靠怀有敌意的国民党军，新四军处境十分险恶，这也为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

国共形成两个战场

全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后，国民党政府在对日作战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其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然而，在战场上由于指挥笨拙和军队素质远逊于敌，结果连连丧师失地，丢掉了半个中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在国民党丢失的地区内展开，开创了一个广阔的敌后战场。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会战，是上海“八一三”抗战后的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前后达90万人，全国军队的180个师中有78个师投入上海。这虽然较日军多几倍，却主要是步兵，炮兵和其他特种兵很少，装备也差，在这一地带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从战略战术看都是很不利的。当地是濒海平原，地形上无险可守，日军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航空部队又可以充分发挥威力。投入作战的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中央系还是各地方系，都怀着对日本长期侵略的仇恨反复拼杀争夺，然而在日军绝对优势的舰炮、地面炮兵和航空兵火力下，部队伤亡极大。至10月末，据日军自己公布的数字，在上海方面伤亡达4万人，而中国军队伤亡达20多万人。在仅有数十公里的战绩上短期付出重大的伤亡，在战史上是少见的。这既反映了中国军人的不畏牺牲，也证明了当时军事统帅的战术呆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



国外杂志所绘抗战时中国军队外貌，左为军官，右二为游击队，另二人为手持美援冲锋枪的士兵，战争后期国民党中央军开始美械化。



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中央军有60个师（占全国军队三分之一），其中有30个师完成德械化，这是德械师的照片。

军火需要进口，原有的储备已消耗大半，补充困难，长期在阵地上对峙，中国军队在火力上与日军的差距日益加大，加上部队疲惫不堪，形势越来越严峻。

这时，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建议将部队撤到原先筑有坚固工事的“吴福线”进行持久防御。蒋介石开始同意这一意见，然而在部队已经向后调动时，因西方九国要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可能讨论中日战争问题，蒋介石认为在上海坚守对国际影响有益，于是又要求部队继续死守，使上海守军陷入极大困境。这时日本大本营将新编的第十军投入上海地区，在日军的总攻下，11月9日蒋介石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此刻前线许多部队已经失去控制，几十万大军在无组织的状态下混乱奔逃。后撤的部队进入吴福线国防工事时，有些未立足即继续后退，有些则找不到打开工事的钥匙。一部分部队虽然占领了后面的锡澄线国防工事，但是因日本第十军已经绕到其后方，也不得不仓促向西撤退。

国民党军在上海坚守了3个月，淞沪会战曾以中国军队的顽强精神使国际观瞻为之一变，然而，在撤出上海时国民党军却出现了大溃退，二十天内即后退了400公里，两道早已修筑好的坚固国防线都被丢弃，日军直逼南京城下。

在上海抗战的同时，日军继续向华北腹地发展进攻。国民党军调集了70多万人的军队到前线，在3个月的时间里对日军进行了重叠抗击，最后仍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

9月中旬，日军占领大同并深入山西北部，随后日军第五师团在关东军一部的支援下进入晋北的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虽遭沉重打击，但仍于10月上旬进至太原以北的忻口。第二战区以晋绥军、中央军20多个师坚守忻口，八路军积极向日军后方出击，使日军第五师团一度陷入前后受敌的困境。然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第二十师团向山西省东部推进，10月下旬攻占娘子关，随后向太原逼近，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忻口方向撤退，随后又放弃太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的会战忻口战役就此结束，这也是国共双方军队配合进行的唯一的大规模会战。

从9月中旬到11月上旬，日军又向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发起进攻，侵占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党军队在平汉、津浦线和太原以北所实施的防御战，与在上海进行防御作战的方式相同，部队基本依托工事成一线固守。虽然守军抱着爱国热情，但是在火力和部队军事素质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采取这种作战方式，必



然陷入被迫挨打并节节败退的境地。

上海方面的抗战以国民党军败退结束后，日军跟踪向南京方向追击。国民党军在南京进行的保卫战因指导错误很快遭到惨败。12月13日，日军攻占该城，随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南京之败固然反映

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暴露出国民党最高当局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自上海战场撤退后，蒋介石曾一度同意主要助手的建议，只以少量兵力进行象征性的防御。随后因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又决定留下德国装备和帮助训练的部队守卫南京，可望增加德国调停的力量。结果日本未接受调停，守卫南京的11万军队因主官先逃，顿时陷入混乱，本来还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多失去组织，官兵脱离而自行乱跑。日军进入南京城区后以“扫荡”之名大肆进行屠杀和奸淫，使大屠杀一直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

南京大屠杀并非如战后有些日本人所解释的那样，只是部分军人的违纪行为。日军在南京实行恐怖屠杀时，城内的西方国家人士曾联合向日本大使馆和占领军当局进行交涉，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陆军决心给南京以打击”。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一直不承认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而只称这是一场“膺惩”性的“支那事变”，可以采取任何残暴手段，而无视任何交战国之间的国际法则。攻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后采取的这种暴行，完全是日本军阀为恫吓中国人民，并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而有意制造的。类似的对和平居民和战俘的大屠杀和淫掠行动，在华北、华中战场的许多地方都一再发生，只是其规模较南京大屠杀事件小一些罢了。

日本军阀企图用恐怖手段使中国屈服，结果却适得其反。空前的民族灾难，使得当时中国的各党派、各阶层和各民族都以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达到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又在1938年内继续对华增兵实施战略进攻。

当年3月，日军从鲁南向徐州进攻。国民党军队改变了以往消极防御的战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式，前左骑马者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日本所绘攻陷南京的宣传画，当年日军空前残暴的侵略暴行也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与反抗。

法，在台儿庄地区对日军进行了防御和反击相结合的打击，取得了中国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大捷。据当时中国方面的战报，台儿庄一战毙伤日军2万人，这肯定有所夸大。据日本的统计数字，其第五、第十师团伤亡共为8000人。不论这些统计数字准确与否，台儿庄之战确以日军的败退而结束。不过，从参战的兵力对比看，国民党军投入了20多万人，日军则不足4万人。

台儿庄之战结束后，日军判断徐州附近有中国军队50个师，这是歼灭其主力的大好机会，于是在5月上旬以南北两个方向对进的8个师团及附属部队20多万人对徐州一带进攻，对当地中国军队形成包围。第五战区的部队无法挡住日军，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后放弃徐州以保存力量。日军利用国民党军后撤出现混乱，跟踪向西追击，进入河南东部。

为阻止日军西进，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造成黄河改道向东南奔流。日军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受洪水拦阻，停止了西进。国民党军在炸堤前保守秘密，不组织居民疏散，结果洪水泛滥淹没40余县，受灾人口1000万，死亡90余万人。国民党当局不依靠发动人民来抵抗侵略，而采取大量牺牲本国人民生命以阻敌的炸堤方式，长期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蒋介石以后从不愿提“黄泛区”一词，却抹不掉这页历史。这段抗战史上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从1938年6月起，日军又将其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指向武汉，此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保卫武汉的作战。参战的部队有第五、第九战区共130个师的兵力，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国民党当局还决定采取机动防



日本描绘向中国军队进攻的宣传画，虽带有自我吹嘘意味，却也表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



油画《南京大屠杀》表现了日本的血腥暴行，这幅画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李自健作品）

御、逐步消耗日军的新的作战方式，且战且退向后方。

当武汉告急时，日军又在华南登陆，于10月21日未经战斗即占领广州。广州及其附近的珠江三角洲迅速失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抗战形势。10月25日，日军侵占了汉口，随后占领武昌、汉阳及武汉周围各重镇。

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能够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在华使用兵力已经达24个师团，还不包括关东军的7个师团，已经不能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且此时日军又发现，在它占领区后方又出现了一个新战场，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游击战。



1938年夏天，蒋介石动员保卫武汉。



1938年夏，沿长江向武汉进犯的日舰。

当日军向中国腹地推进时，在“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八路军、新四军反其方向而行，展开了向日军后方的大进军。从1938年春天开始，八路军从山西分路东进，到达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冀中平原，一部向北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和河北东部，建立起冀鲁豫、冀中、冀东、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在后方到处遭到袭击的日军，开始认识到八路军对它的威胁。于是从1938年3月起，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开始抽调兵力向晋察冀、太行和晋绥根据地进行“肃正讨伐”战，并大大减少了向正面战场进攻的部队。八路军就此在各根据地展开反“扫荡”战斗，这种战斗样式以后一直持续了多年。

新四军到达长江两岸时尽管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但仍于5月间挺进苏南日军后方，并在南京附近开展了袭击日军车辆和小股分队活动，使上海至南京之间的铁路一度中断。随后，新四军又在以茅山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日军为保卫其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安全，在武汉会战期间不得不将两个师团留在苏南担任警戒，严重影响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在日军后方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采用了全新的战法。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陆军主要以日本为师学习近代军事，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军的大批将领都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内军官学校也依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军队普遍以日本陆军的《步兵操典》作为训练作战的基本准则。对日作战开始后，国民党军仍机械地模仿日军的正规战术，而自己的武器、兵员素质又远不如日军，这样的徒弟就难免总是败给师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利用过去在国内战争中长期从事游击战的经验，以日军事先根本未预料到的方式



武汉失守后，在南昌附近日军九四式坦克同东北军第四十九军激战的场面。

进行了灵活机动的规模小却广泛的机动游击战。这种战法与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因使用兵力于敌人后方，使日军的运输线和后方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就这样，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战全面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从当时日本统帅部的正式命令中，也证明了这种划分是对的。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确定了《作战指导方针》；同年12月又确定了《大陆命第241号》和《陆军支那作战的指导》。这些命令中要求在华日军担负两种任务：一方面在正面向国民党军进行“压制作战”，一方面在后方主要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治安战”（又称“肃正作战”）。至此，日本方面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企图完全落空，不得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持久战。

从中国方面来讲，抗战自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前一时期虽然日本大举入侵，但国内却充满全民族精神振奋的蓬勃朝气；这一时期外敌的大规模进攻基本停止，但国内却逐渐出现沉默气氛。这种违反一般战争规律的特殊现象，只能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得到解释。

“游而不击”和“消极抗日”

对武汉失守后国共双方军队的表现，当时乃至战后许多年里国共双方的宣传材料和史书中都有不同的写法。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

击”，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客观而论，敌后的解放区战场上确实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不过，小规模游击战的确是开展得轰轰烈烈。与正规战相比，游击战争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声名，然而，在人口多达2亿的十数省范围内全面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争，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在抗战全局仍起到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拖住侵华日军半数左右的兵力，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方向。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军在中国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隙，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这样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当过去的老红军刚刚奔赴抗日前线时，还习惯于像过去国内战争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时不理解。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实践，人们深刻感到了毛泽东的方针正确。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情况来看，只有进行游击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和保存发展自己的目的。抗战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总共只有5万多人，使用的是原先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缴获的破旧武器。国民党政府只发给一点微薄的军饷，基本不提供武器弹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武器，只有1938年的120挺苏制轻机枪。在抗战开始后的两年内每年仅发给几十万发子弹，平均每人每年只能领到一两发子弹，以后还完全断绝了供应。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付强悍凶顽、一般不肯缴枪的日本军队，就不能靠打拼火力的、摆堂堂之阵的正规战。

当年的指挥员都明白一条基本的原则：打一仗前，先要计算消耗与缴获之比，如果能缴获1000发子弹而只消耗500发子弹，这仗才能打。如果消耗大于缴获，即使打赢了也要算败仗，因为这样再打几次，枪就会变成木头棒



子。作战条件如此困难，要与世界强国之一日本的精锐部队对抗，只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支援的优势，军民配合，以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形式巧妙地与敌周旋。例如晋察冀边区就提出，每县要做到一天消灭一个鬼子，这样全边区200个县一个月的战果就是6000人，相当于歼敌1个旅团。国民党战场上那几次大规模的会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打，可是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的战果仍很辉煌，其战略作用并不亚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

至于“游而不击”而能“乘机坐大”之说，则根本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准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在日本侵略者后方开创广阔的根据地并坚持下来，是一件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因为敌后只要有抗日军队活动，其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的日军就马上会以重兵“扫荡”或“讨伐”。日本侵略者以其东方色彩的军国主义特有的毒辣和狡猾，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而且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这种艰苦环境中，八路军只有坚决“击”敌并打退日军的“扫荡”，才能坚持生存下来；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它自己的部队却在敌后无法生存。如仔细计算起来，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留在敌后的军队比共产党挺进日军后方的军队数量要多得多，只是在华北稍微落后了一步。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进中原时，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看到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

“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

会上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

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①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安排前线三分之一的兵力到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派鹿钟麟率部进入河北，建立冀察战区，同时又在山东和苏北建立

^①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了以韩德勤为首的鲁苏战区，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打游击。

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战却没有打成，这里的关键在于其军队不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了训练游击战的干部，蒋介石于1939年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由第



叶剑英（前排中）率八路军教官参加南岳游击干部学习班，并担负主要教学任务。

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路军教员任课。共产党的教员们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因没有群众基础，建立不起根据地，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在日军“扫荡”下，许多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只是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这样自然无法长久生存，或逃回大后方，或投敌当了伪军。加上部分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也遭到消灭。这样，到1943年以后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基本被清除，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持了下来。

当时国内的人心向背，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态度坚决，这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部分，当年的延安正是以其蓬勃的精神面貌吸引了全国的进步人士，使黄河之滨集合起中华民族一批最优秀的子孙。对于习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了共产党才感受到光明。据统计，抗战前三年陆续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4万人，只是后来因国民党封锁交通才阻止了更多的人前往。如果再将投奔其他解放区的知识青年都加起来，总数也有10万人以上。同期国民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才不过3万多人。究其基本原因，一是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日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方向，二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人的廉洁作风，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许



多进步人士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如同美国记者斯诺所描绘的圣洁形象。“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就是时人的生动形容。南洋最大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曾回国视察后方各地，最后向各界宣布：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油画《百团大战》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八路军在敌后出击，以打破国内的投降妥协图谋。（沈佳蔚、李如作品）

相比之下，国民党战场的条件比敌后解放区战场好得多，但其战绩却很令人失望。在思想解放后谈到“消极抗战”一词时，许多原国民党军官兵表示委屈，说我们当年打日本是很坚决的。公正地讲，讲“消极抗战”，并不是指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下级官兵，而是指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许多人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点上，如此用词的确不冤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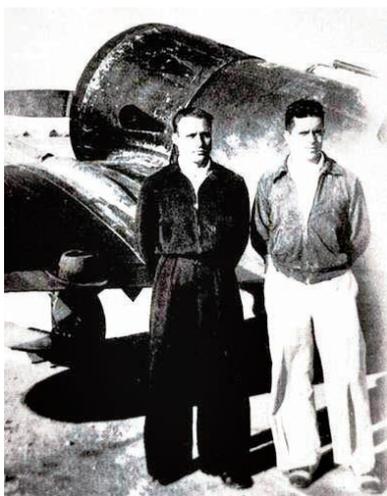
讲到抗战的主导思想，国民党总想依赖他人取胜，并一味要外援。抗战初期它主要寄希望于苏联打日本，这也是当时停止内战并与共产党事实上实行合作的重要原因。苏联支持中国抗战，则主要是为了拖住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因此并未如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直接对日军作战。不过在1940年以前，苏联是唯一以实力援助中国的国家，其从1937年秋天起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飞机及其他武器装备，1938年还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此后两年间又提供了2.5亿美元。苏联除了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外，还以“志愿航空队”的名义派出空军及军事专家、技术人员共3000多人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这些援助都是给予国民党政府的，对延安没有任何武器援助。不过这样反而成为好事，由于没有打通国际路线，苏联也未能向解放区提供援助（这也与国民党坚决反对有关），这样反而逼着中国共产党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如果端别人的碗，就很可能受别人的管，到头来会变成人家棋盘上的棋子。

由于战争总想依赖他人，日本又加紧诱降，因此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积极性开始下降。从1939年年初至1941年秋天，日本军队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没有发起战略进攻，双方基本形成对峙。这三年间作战的规模与武汉失守前相比大大下降。日军所发起的战役进攻，不仅范围很有限，时间也比较短，大体上每次战役都不超过一个月，而且大都是速进速退的活塞式攻击。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资料，对国民党战场担任主要攻击任务、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在1939年、1940年两年使用弹药的数量，仅为1938年一年用量的五分之一。

这一期间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的主要进攻，只有1939年年末至1940年年初的“冬季攻势”，其目标只是较小的据点，只是在广西的昆仑关进攻规模大一些，最后也以败退告终。国民党方面在对日作战的规模和积极性不断下降的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却日益紧张。特别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日军后方发展壮大力量感到不安和恐惧，因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加紧限制，后来甚至发展到军事进攻。

除了军事上的日益消极外，这一时期政治上投降妥协的危险也屡屡出现。1938年年末，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出重庆，随后在日本占领军的羽翼下建立了伪政府。由于汪伪政权成立后未能像预料的那样引起国民党内实力派的响应，日本方面只得再度对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做工作。1940年2月，日本支那派遣军参谋今井武夫大佐、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会见了据称是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弟弟的宋子良（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双方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秘密谈判。结果在剿共和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只是在



1937—1940年，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累计操作1200多架飞机，投入2000多名飞行员，其中有211名飞行员在中国牺牲。



日本在关内驻兵等问题上仍争执不下。

进入1940年秋，面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英国、美国感到继续妥协只能使日本得寸进尺，同时认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拖住日本对它们更有利，于是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同年10月，英国在关闭云南至缅甸公路三个月期满后，不顾日本方面的威胁，立即宣布开放这条公路，并加大了运输量。同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承认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也以私人身份招募飞行员到中国参加抗战，随后成立了志愿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虎队”。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以“宋子良”的名义与日本在香港秘密进行谈判就无法达成全面协议。

看到争取蒋介石一时无望，新任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决定停止在香港进行秘密谈判的“桐工作”，以主要力量加强汪精卫政权，并对一些国民党地方军阀分别展开“谋略工作”。当时有少数地方军阀也与日本勾结，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是突出一例。

阎锡山是自中华民国建立后就割据山西的老牌军阀，历来强调“存在高于一切”。抗日战争前阎锡山本人与日本军阀经常来往，战争初期他退到山西省西南，为保存实力一再向日军秘密求和。日军为争取阎锡山，也基本停止了对他的进攻，并长期进行代号为“对伯工作”的诱降。阎锡山通过与日本的反复谈判，就一致合作反共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42年5月5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阎锡山在山西南部的安平村会面，双方就合作的基本概念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阎锡山看到国际形势对日本不利，又不肯公然投降日军。尽管阎锡山本人始终未公开脱离抗战营垒，然而他所辖的第二战区部队在几年时间里事实上与日本第一军实行了休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重庆国民党政府闻讯后欢喜若狂，一些国民党官员甚至对美国人称：“你们的珍珠港灾难日就是我们的胜利日。”至此，已经与日本全面作战四年多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可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随后在前线的行动却更加消极，有很多部队长期处



阎锡山曾是“华北王”，1930年5月他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抗战期间他在蒋、日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周旋。

于静坐状态。例如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拥有3个集团军，却有2个在六年时间内用来封锁和监视陕甘宁边区，只有1个在黄河边与日军对峙，自1939年以后六年间除了偶然性的隔河打点枪炮之外，从来互不进攻。潼关一线因长期无战事，结果在双方的枪炮对峙下竟成了进行走私和物资交易的市场。

鄂西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六战区有十几个军兵力，对面日军长期只有驻守宜昌的一个加强旅团，可是只要日军不增兵发动进攻，第六战区也就从不向日方展开攻势，双方竟在几年里互不相扰地静坐对峙。陈诚起家的部队、国民党军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在宜昌附近的石牌要塞守备两年，只有一次派出一个加强连迂回日军浅近后面做过袭扰，还没有什么战果。当时的第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回忆说：

“双方在阵地相互以枪炮射击都很少，以至部队出现疲沓现象，如十八师阵地正面，敌我隔山谷对峙，而山又是光秃秃的，无可掩蔽，以致第一线送饭，都利用夜间，因而都要吃冷饭，双方喊话取得‘协议’，不向伙食担子射击。”^①

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前线，中国士兵还可以时常听到日军用以瓦解军心的广播宣传。在中国战场，日军常以“支那小姑娘，支那之夜，梦一样的夜……”这类歌曲刺激自己的官兵，对中国人则经常播放那些利诱商女唱出的靡靡之音，以麻醉那些梦里不知亡国恨的人。在前线的一些地段上，日军的喇叭里经常播出“人生难得几回醉，何日君再来”的曲调。接着，又可以听到喇叭里在喊：

“华军诸君！日华两国同文同种，古代秦国的徐福东渡日本，现在我们日本人到大陆，都是为了日华亲善，共存共荣。可是贵国政府不响应日本解放亚洲的号召，不肯合作，还勾结英美，以致兵戎相见。几年战争，双方各有伤亡，实令人痛心。望你们理解皇军的好意，双方都停止战斗，尽快实现和平，一同驱逐西洋人，日华携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听到这类宣传后，有时前线士兵就集体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回敬《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曲调。在当时，上级的命令一般是要他们坚守阵地。这样，在日军不进攻的地段，多数形成了事实上的休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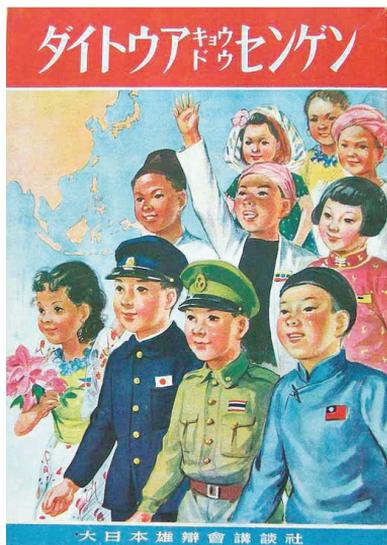
对这一历史事实，战时国民党最主要的盟友美国政府也不否认。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也如此述说：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第85页。



“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①

在这本著名的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虽然也攻击了共产党，然而对国民党方面因争权造成对日抵抗“部分瘫痪”的评价，大致还是准确的。也正如白皮书中所说的那样，国民党当时保存实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



日本在战时鼓吹“大东亚共荣”的宣传画。

^① 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为公布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引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合作乎？ 溶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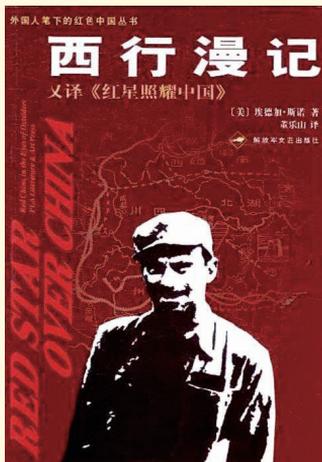
日寇铁蹄入侵神州，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共两党也走到一起共同抗日，然而，双方在合作抗战时的基点和目标完全不同。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6月，刚刚确立了全党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就对未来的形势预测说：

“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

斯诺对此还记述说：“毛泽东主席并不隐瞒那些目标，而我在报道中也没有避过它而不强调。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他从容沉着地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它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①

斯诺从陕北归来所写的报道和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这些观点公布于全世界。该书在中国国内发行时为避免其名过分刺激，改称为《西行漫记》，里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写下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①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4页。



面的内容却并无删节。现在尚未考证出蒋介石是否看过此书，却无疑会知道毛泽东当时的这些公之于世的思想。他自己在抗战期间对待共产党，态度也很明确。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中共的四名国民参政会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时，十分坦率地这样说道：

“我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这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就是死了心也不安，抗战就是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共产党领袖明确表示想要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国民党总裁则宣布要将共产党合并入自己的组织加以溶化。按照周恩来的形容：“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①双方在抗战期间的激烈斗争就势不可免……



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采访毛泽东时拍摄的照片。

两党的三种合作方式可供选择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关了13天，1936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被释放返回了南京。此后，国共双方谈判合作的步伐加快，可是政治上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根子正在于国民党是以“收编”和“允许输诚”的态度对待共产党。

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在此会议上，宋庆龄、冯玉祥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过去追随蒋介石的李烈钧等“党国元勋”和孙科等人也签了名，说明停止“剿共”政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在政策上也作出了重大让步。

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保证下列四项：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 (2)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 (3) 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
- (4) 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就是著名的“四项保证”，也是共产党一方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必要妥协。因为只有停止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与国民政府才能合作；只有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才能停止“剿共”。

当然，由于共产党并非投降而只是让步，国民党方面为求得和平及稳定同时也作出了妥协，其核心是停止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不过表现在文字和声明中，却是一副傲慢自大和以胜利者自居的态度。这次五届三中全会最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作出的决议案，名称就是《根绝赤祸案》。

仅从此决议之名，即可看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再看此决议的内容，开始就形容过去十年间“赤祸”如何“危害国家”，共产党的农村土地革命如何使南方几省“田庐为墟”。最后此案声称，要求中共“彻底取消其‘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根绝赤祸”。作为交换，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共的武力“围剿”，代之以“和平统一”。

蒋介石在同月给在西安负责与共产党谈判的顾祝同下达的指示，也说明原则是“编共而不容共”，采取的是一种“纳降”的姿态。

这明显是最后消灭共产党的目标未变，只是策略和手法的变化。其根源又非某一人的固执，而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并未解决，只是因外部矛盾激化使其一时居于第二位而已。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奋斗的大目标同样没有变。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进程中，抗日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具体路线要服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目标。在抗战期间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同时，还要警惕不被溶化消灭，并积蓄力量准备最终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对此，毛泽东与斯诺所说的那番话，已经直言不讳地坦诚表白。

不过这一奋斗目标在中共党内却短期出现过异议。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的路线在党内一度受到挑战。11月29日，当一架苏联飞机突然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从机门走下来的那个身高1.5米的小个子王明，一副手持“尚方宝剑”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因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前右一）从苏联返回延安，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其错误意见却受到毛泽东抵制。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王明（前排中央）刚传达完共产国际精神。

为他背后的支持者是斯大林，毛泽东赶到机场欢迎时也称其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此时正忙于内部清洗的斯大林，最怕的就是与德日两线作战，以中国拖住日本是他坚定不移的信条，而拥有最强实力的蒋介石又是寄予希望的主要对象。为了苏联的眼前利益，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牺牲自身利益为其外交

政策服务，竭力拥护国民党而不应展开斗争。苏联援华的军火也都给了蒋介石，只有一次试探性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过愿意无偿赠送给八路军少量武器的建议，遭到责难后马上收回提议。不能得罪蒋介石，不能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派王明归国时所确定的原则。为了保证这个小个子平安地到达，斯大林在王明和康生一起上路前，亲自向苏联飞行员交代，要绝对保证安全。

这个把苏联利益放在中国利益之上的王明，果然不负所望，下机后就在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他的国际背景，一时还影响了党内部分人。

不过王明毕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领导，这里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国内斗争的经历，在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军队干部中没有任何威信。在当时的中国，确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有军则有权”，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如此。从王明的经历看，他1925年入党后即去苏联留学，只是两年后在中共五大时回国当过国际代表米夫的翻译，会后又去了莫斯科。1929年他回国后在党内闹事，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靠米夫支持由普通党员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实际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不过他贪生怕死，从来没有去过苏区，没有当过一天红军，掌权几个月后又从上海跑到苏联，当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看来，当中国革命大功快成之时，就可以模仿列宁那样在欢呼声中从国外回来进行领导。

殊不知当他回国时已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激烈残酷的斗争实践的检验中，毛泽东以其正确和英明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从未到过农村根据地，更未打过一次仗的王明在党内军内甚至不认识任何一个师长、旅长，调不动一兵一卒，全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唬一下人。当这些教条在实际中不灵光后，人们就像《黔之驴》那篇寓言中的老虎观察贵州的毛驴一样，由盲目的敬畏变成轻蔑地认为“技只此耳”！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口号出台后马上受到许多人怀疑，毛泽东随后也进行了专门的批评。当时蒋介石根本不承认“统一战线”这个概念，要国民党服从是十分可笑的。而要共产党单方面服从，就只有一切服从国民党。至于王明所说的军事上的“七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等，更只能让此时只有十几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被“统”到拥兵数百万人的国民党军中间去。根据无情的客观规律，讲统一，实力弱小的一方一般都要被实力大的一方所左右。直至1958年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搞“联合舰队”，毛泽东的反应都是极为震怒，并以手上的大拇指比喻说苏联的海军



有这样大，以小拇指比喻中国的海军只有这样大，并问到底是谁指挥。像这样不平等的“联合”和“统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毛泽东从来不能接受的。

王明回国后即到武汉见蒋介石，并在那里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一时负责起南方党的领导大权。结果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空空洞洞。在北方大地上，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领导的北方党的工作和当地八路军却迅速蓬勃发展，扎扎实实地开创了局面。1938年9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稼祥由任弼时接替而回国前，负责共产国际日常工作的季米特洛夫要他转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内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个流亡苏联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并没有决定他党领导人的权力，所表达的只能是斯大林的意思。作为一个政治家，斯大林毕竟最尊重的是现实，最注意的是实力地位。于是，在这年9月末至1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王明的右倾路线受到批判，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终于在全党得到公认，只有皖南的项英等个别人对此还不能很好贯彻。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不过对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抗战还是设想了三种方案，并于1938年间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这三种方案是：

1. 恢复民国十三年（注：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加入；
2. 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3. 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①

按当时的概括，这三种方案分别称为党内合作、党外合作和遇事协商。

其实，从西安事变起，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就一直没有法定的形式，只是遇事临时协商。这种协商，又大都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个人之间的约见谈话。1937年6月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到“国共合作”时，蒋的回答是不能承认党派合作，只能与他个人“合作”。这种个人出面协商的方式虽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然而关系很不巩固。因为，中共中央最希望能实现第一套方案或第二套方案，毛泽东曾亲自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按照大革命时期的方式，共产党在保留原组织的情况下，全部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与其他成分合作。

国民党的态度却是可以允许共产党参加，却不能保留原来的组织，只能

^①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页。

以个人身份加入并溶化其中。从1938年年初开始，国民党中的CC派、复兴社大肆鼓吹起“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说这是使国家强大所必需，甚至以纳粹德国为例。这一口号作为标语，一时贴满各地的会场，并刷在国统区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其中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中国只能有国民党这一个政党、只能有三民主义这一种主义、只能有蒋“总裁”这一个“领袖”。

此套宣传虽然仿照希特勒，某种意义上也学习了苏俄的一些方式，更深的内涵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封建专制主义，即“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那一套。只不过经过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封建与法西斯二者一拍即合（国际上搞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如德日恰恰也都是封建传统浓厚之国），变成了当时人称的新专制主义。

当时国民党内听到共产党表示要依照当年之例实行“跨党”的“党内合作”，许多人也大起恐慌。他们对广州时代和北伐时的经验总结是，共产党从国民党一大至“清党”这三年间“寄生”国民党内，结果大大膨胀了实力，国民党反有被从内部“篡夺”的威胁。因为“跨党分子”有严密组织，国民党本身却十分松散，在党内合作后患无穷。

蒋介石本人也持这种看法。1938年内他与周恩来几次谈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共产党的“跨党”提议，认为共产党最好取消自身的组织全体加入国民党，如果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他还说想约毛泽东到西安一谈，后又见共产党不会让步又取消邀请。同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见到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这四位中共代表时，一听到“党内合作”的提议，又心情大为激动地说：

“这件事我早讲过了，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可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的！”

面对早年在日本第一批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内原来资格比自己还老的吴玉章，蒋介石又以充满感情的口吻说：“你是老同盟会，又是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马上表示自己已经认定了共产主义，不能“二三其德”。蒋介石见谈不拢，此后再不提及此事。

“党内合作”搞不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外合作”也得不到同意。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可以合法存在，更不承认他们与自



已有平等的地位，只能居高临下地要别人“接受政府领导”，岂有“合作”之理？

那么只剩下“遇事协商”一途了。蒋介石对此方式既未正式承认也未否认，他有求于共产党时也主动找周恩来等人。根据他的邀请，中共有代表团驻重庆，国民党政府也派联络参谋驻延安，这实际上就是遇事协商的方式，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也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

暗算与摩擦

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相对较好一点的时候是1937年秋至1938年末。其关键原因在于日本逼蒋太甚，国际上又只有苏联援华，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联苏和共政策。

日军占领南京后，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不肯屈服，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承认国民政府并公开表示要扶植全国性的伪政权的态度。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宣言声称：

“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重新调整两国关系并建设新支那。”

既然连蒋介石是“对手”都不承认了，自然不能再打交道，日本就此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全面抗战开始后半年国民政府并未与日本断交）。1月18日，国民政府再次宣布要“抗日自卫”，不承认一切日本的傀儡组织。同年春季，日本内阁见战争久拖不决，也试探着再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秘密谈判，前提条件却是要蒋介石下野，换上“亲日派”的首领才能议和。对于爱权如命的蒋介石来说，这时只有坚持打下去。

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转折，一方面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在敌后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20余万人，活动范围遍及敌占的十几省，这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日益恐慌起来。

“副总裁”汪精卫索性逃出重庆，网罗国民党中央委员20余人投敌，在南京又组织了一个伪国民政府和伪国民党部，当了汉奸。重庆国民政府方面虽然仍坚持抗战，可是对日作战的规模和积极性也不断下降。同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紧张。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许诺不在“友党”即国民党内发展党员，可是蒋介石在1938年12月会见中共四位代表时更进一步说：“共产党在国民

党外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两党关系必然走向恶化。

武汉失守三个月后，即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许多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和元老们都在会上惊呼共产党的力量壮大，蒋介石则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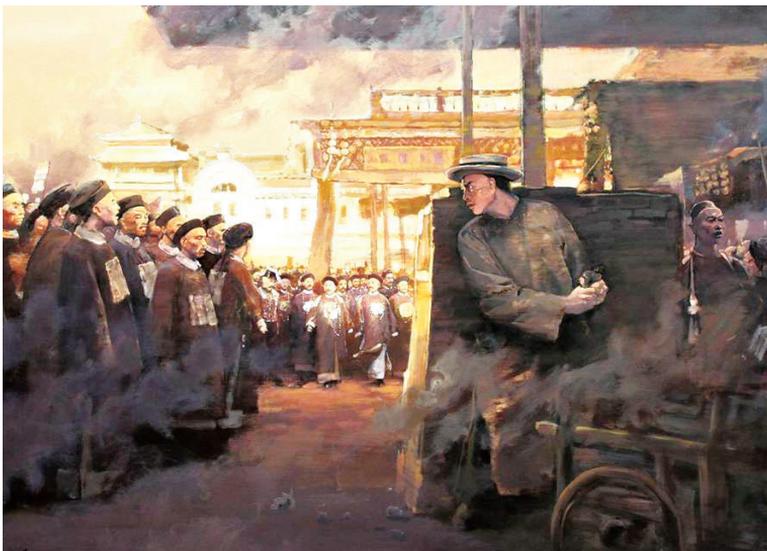
对共产党是“溶”不是“容”，这是蒋介石与孙中山的一个基本差异。由于日本这个大敌当前，此时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主要采取政治限制，不过也伴之以武力进攻。在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文件，随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华中、华北等地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摩擦就日益加强。

其实，蒋介石停止“剿共”后消灭共产党之心从未收敛过。就是在国共关系比较好的抗战之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害和破坏活动也从未停止。当然，对共产党职位高的领导人国民党还是礼遇有加，以维持两党关系。可是，暗地对职务较低的人员却未停止过迫害，并认为中共中央不可能因这类小事而与其闹翻。所以周恩来、董必武等有名的共产党人长期身居虎穴，却未被动一根毫毛，下面的基层党员却时时有遭暗害和抓捕的可能。

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对“小蒋介石”要杀，以消灭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对“大蒋介石”这类头面人物则可以宽待，以造成好的对外影响。兵团司令、军长一类的大战犯可以吃小灶，被特赦后还能当政协委员；伪连长、伪保长一类则要受镇压或长期戴帽管制，原因正在于此。

在战场以外的场合，共产党在基层与国民党斗争主要是靠发动群众，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则主要是靠特务和个人暗害等恐怖手段。若追根溯源，国民党自它的前身同盟会成立起，就以搞个人恐怖活动起家，对溥仪之父摄政王的刺杀计划就是先例。蒋介石本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出马建立的“功绩”，也就是在辛亥革命时奉其师傅、号称“杨梅都督”的青帮头子陈其美之命，潜入上海的法租界医院，用手枪暗杀了在同盟会内与孙中山作对的另一个革命家陶成章。共产党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主张群众的阶级革命，反

^①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油画《吴樾刺杀清朝出洋五大臣》表现了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成立起，就着力于暗杀一类活动，蒋介石又将其用于消灭政治对手。（李如作品）

针对个人的暗杀活动。在白区工作时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即“红色恐怖队”的简称）干掉个别出卖组织的叛徒，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内部保卫措施，并不用于对付反动阶级头目。其实，恐怖主义行为历来被广大人民厌恶，即使在正义斗争中采用也会导致脱离群众，在维持寡头独裁统治时实行此法更会造成人心丧尽。

蒋介石由于其独裁统治与广大群众对立且不得人心，不得不广泛依靠特务组织，并建立了规模远胜武则天时期和明朝“东厂”“西厂”的秘密镇压机构。军统、中统这两大特务组织，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急剧膨胀起来的。军统后来的局内编制人数达4万之众，如加上受其指挥和为其服务的人员则数以十万数。蒋介石为军统、中统规定的任务，就是四个字——“防敌防奸”。

这四个字说明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两大项并重的任务，即对“敌”和对“奸”。“敌”是指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还在对日作战，搞日本方面的情报，捕捉渗透其后方的日特汉奸还是必需的。所谓“奸”者，就是指共产党。因停止“剿匪”后，国民党文件上不便再称共产党为“匪”，于是开始以“异党”“奸党”代之。后来又随之派生出“奸伪”“奸军”“奸伪区”“奸匪”等一系列诬称。到了抗战后期，“防奸”所耗的精力甚至远远超过了“防敌”。



戴笠陪同蒋介石等检阅重庆特警班。

1938年4月，在国共双方合作最密切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策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叛逃。跑到国民党方面的张国焘开始满怀希望能得到大官，谁知他得到一个“中将”空衔后，蒋介石只说了一句“委屈你去帮一下戴笠的忙”，结果随即被派到军统少将戴副局长（名义局长由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兼任）的手下，成了“走狗的走狗”。张国焘刚去军统时，戴笠把他当成最得意的部下，邀请客人时都要先说一声：“今天你到我这里来，就能看到共产党内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所谓“第三把交椅”之说，是指王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来后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所列的名单，头三名是毛、周、张。其实，王明当时在党内实际地位列为第二，只不过为显得超脱一些而不将自己列入。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中的四名中国委员排序，也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周恩来、张国焘。这个投靠国民党的共产党大叛徒的党内位置其实是列为第四，而且在受到全党批判后名声已臭。

在共产党内排名第四位的张国焘叛逃后，蒋介石着实得意了一番，对人称“这是对延安方面致命的打击”，要戴笠好好地“加以利用”。张国焘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向共产党内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进行策反，鼓动他们叛逃投奔国民党。按照旧中国军阀部队“兵随将走”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想象，长期把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主席”应该能拉出不少部队。殊不知共产党在军队中是以政治信仰维系官兵，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名义指挥时能调动几万人马，可是一旦投靠了国民党，却一兵一卒也拉不走，连他的警卫员也带枪离他而去。



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虽然有个别人叛逃，其实也并非张国焘努力的结果。如原红九军军长何畏就先于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朱德崇后来在晋冀鲁豫边区因贪污受查处后畏惧惩处而逃。朱某出身绿林为一贪财的莽汉本不值一提，何畏在党内军内倒是老资格。此人出身工人，在当年按来自苏联的传统逻辑这是头等金字招牌，这成为他后来一直受提拔重用的重要条件。可是何畏同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人事史上写下的都是不光彩的一页。在著名的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何畏就担任了工人纠察队队长，1929年百色起义前他被派往广西工作，在红七军担任过师长，负伤去上海医治痊愈后又去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又任过师长、军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1937年夏，何畏向中央提出要去西安治伤，得到批准后就一去不返。国民党把他派到老上级张国焘手下，一同向过去的战友们写信并派人劝降。结果去信无回音，连派去的人都不见归来。何畏此后一直受冷落，1949年人民解放军过长江后他在苏南被国民党抛弃，自杀身亡。张国焘也遭戴笠疏远，出门要汽车都不给。在重庆时一次他坐在黄包车上，路遇坐在汽车上的周恩来，羞愧得急忙低头缩脑。全国解放时特务头子毛人凤要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认为共产党不会杀他，张国焘考虑再三后还是逃到香港，后来曾一度表示想回来，毛泽东认为不好安排而没有同意。张国焘流落他乡，只有靠卖回忆录吃饭，1979年冻死于加拿大的老人院。

在国内战争停止和阶级矛盾拼杀暂时有所缓解的情况下，共产党内那些少数叛逃者差不多都是受金钱、享受的诱惑。除了原红四方面军的个别干部外，原红一方面军的八军团长、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周昆也是典型。他在抗战初期任一一五师参谋长，1938年年初他去临汾领了军饷10万元，让警卫员拿了5万元先回师部，自己带着其余的款子潜逃。不过周昆随后失踪，国民党方面也无此人消息，在当时的战乱中很有可能丧生于拦路抢劫的土匪之手。另外，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团长、原红二十五军的师长张绍东在抗战初期也离队逃走为匪，混不下去后才投了国民党。

除了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对各处活动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人员实行袭击和暗杀。1938年8月间军统特务机关就经蒋介石的同意，在西安绑架暗杀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宣侠父。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生，在校内就因反对蒋介石而深遭其忌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以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的公开身份广泛活动，特别是向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官开展统战工

作，这被认为是挖了蒋介石的老根。于是一天晚上他在路上行走时突然被特务架走，随后被勒死偷偷掩埋。此后，八路军办事处长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并要人，回答都是不知道。几年后蒋介石才对周恩来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反对我，我叫人杀掉了。”

在国共合作尚属最佳时期暗害活动尚且如此，到了1939年春天以后双方关系日益恶化，血案更是迭起。当年6月12日，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袭击，出现了著名的“平江惨案”。这一通讯处对外是湘鄂赣苏区游击队集结后的留守单位，在内部是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负责当地党的工作。负责人涂正坤对外是通讯处主任，党内职务为特委书记，是当年著名的平江暴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写有“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一诗。由于这一通讯处地处偏僻区，与外界消息不灵通，国民党杨森部就选择了这一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对共产党公开机构下手。

杨森在历史上是擅长投机的军阀，北伐期间他开始归顺武汉革命政府，以后又受蒋介石收买反共。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他忽而反这个，忽而打那个。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他开始为自保以“红军总司令故旧”之名相联络，后来又与之刀兵相见。抗战开始后他率兵出川，武汉失守后退到平江一线，视当地新四军通讯处为眼中钉，得到上峰同意后就下令动手。事变当天，杨森派副官以有事相商之名将涂正坤骗出，立即以伏兵用乱枪将其打死，然后川军特务营一举冲入通讯处，将八路军副官罗梓铭（在内部接替涂正坤任特委书记）等八人绑出，于夜间全部秘密活埋于山间。事变中只有一个女同志逃脱，经辗转到达重庆，才揭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

事变发生20天后，7月2日中共中央才得知这一消息，于是立即向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抗议，要求查处此案。陈诚复电反诬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称杨森部系进入通讯处搜索时遭抵抗发生枪战才将新四军人员打死，“系适当处置”。

同年11月，国民党驻河南确山县的特务机关又组织当地保安队和民团等武装，围攻新四军驻当地竹沟地区的留守处。这一留守处原是中共中央原局机关的对外掩护名义，为发展华中的指挥部门，关系重大。当时刘少奇等负责人已经离开，其余人员遭围攻后突围东撤，未撤走的伤病员和家属约200人被杀害。此事当时称为“确山惨案”。

进入1940年后，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人员的抓捕更为厉害。3月间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特务机关诬称是中共地下组织指挥，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



记罗世文及军委书记车耀先等十余人。周恩来后来一再向蒋介石交涉放人，蒋介石始则推说不知情，后则称已病死狱中，其实，直至1946年内战爆发后，罗、车二烈士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被枪杀。

由于国民党连续制造这些惨案和事件，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机关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各办事处被迫收缩。至皖南事变发生，只剩下重庆、西安两地还保留有机构。

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驻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尚且如此压迫和攻击，在双方军队相处时武力摩擦乃至进攻的事件则更多。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向西北的国民党军头目朱绍良、胡宗南下达了“严防奸伪向西南流窜”的密令。随后，西北的国民党军就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绵亘三省，并增加包围边区的军队至20余万之多，双方的武力冲突也连接发生。

1939年秋至年末，在陕甘宁边区西南的淳化、正宁、镇原等五县发生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勾结驻军进攻和武力驱赶八路军的事件。按当时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和解放后一些党史的写法，称为国民党军“侵占边区五县城”。此说固然有道理，不过国民党方面并不承认这五县属于陕甘宁边区。仔细讲来，这五县在内战停止后被国民党同意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有八路军驻军和共产党的组织，可是当地县政府、保安队仍是国民党方面的，当时人称为“统战区”。也正因为有此特殊情况，国共双方对陕甘宁边区辖区的计算也不一致，共产党方面一直称边区23县，国民党方面只承认18县。

在这种八路军驻扎部队、国民党控制县政府并拥有保安队的地区，制造摩擦和反共事件自然容易。1939年夏天，当地县政府就一再组织人袭击八路军零散外出人员，甚至偷袭驻地引起武装冲突。八路军驻外办事处找国民党甘肃政府和陕西政府交涉，双方派员查办，却毫无结果。11月间，这五县国民党政府又与胡宗南部勾结，公然以正规军向八路军驻军发起进攻。八路军在当地因兵力处于劣势且考虑到大局，撤出这五县的县城和部分乡区。

陕甘宁边区西部告急后，中共中央马上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调动黄河以东的八路军劲旅一二〇师的三五九旅从晋北回援保卫边区，同时夺取延安以东的绥德六县。绥德一带在陕北是最富的地区，居民养育得也好，人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当时八路军干部中有很多人到米脂找老婆，到号称“陕北的上海”绥德买东西，据说新中国成立后米脂县长期所收嫁出去的干部家属汇款都多于县财政收入。可是这一地区在陕北山河“一片红”的

年代却并不属于苏区，抗战初期的三年间也由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何绍南率部盘踞。对于何某人中共中央曾多方争取，他每次路过延安时毛泽东都亲自招待并做工作，可是何某顽固不化。由于绥德地区靠近延安，被划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黄河防线，同时又是延安通往前方的主要通道，过往的共产党干部和部队很多，坚决反共的何绍南虽多方刁难，毕竟因兵少力薄而不敢随便滋事。当国民党进攻边区西部时，正好为八路军解决何绍南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1940年2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绥德一带后，何绍南大为恐慌，声称“前线回窜溃兵入境”，命令各县紧闭城门并严加防范。在取得当地群众同情和支持后，三五九旅向何绍南部发起攻击，一举将其大部缴械，何本人率少数随从逃窜。

八路军夺取绥德专区六县后，为避免激化与国民党方面的矛盾并争取各界同情，毛泽东专门指示：“靠近榆林的米脂、佳县暂时不要边区化”，“绥德、吴堡、清涧、安塞四县边区化，也应是逐步大体上的边区化，不是说和老边区一模一样”^①。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策略原则，绥德地区在很长时间里名义上仍不列入陕甘宁边区。为了使驱逐何绍南一事显示出有理，陕甘宁政府组织当地士绅名流上书国民政府，列举“犯官何绍南”的种种罪状，并“请求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重庆国民党当局看到这种呈文真是哭笑不得，虽坚决不准，可是面对王震已经上任绥德专员的事实也无可奈何。

夺取绥德地区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东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保证边区内部稳定，又将国民党设在各县的党政人员“礼送出境”。

被“礼送”的人员是在抗战初期进入边区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当局不履行原先已同意的承认边区原有政权机构的诺言，向各县派出县政府和党部。考虑到全国统战大局，边区政府在来者不带武装的情况下允许其进驻，同时要求各县原有的机构照常办公而不得向其交权让权。此后近两年间，陕甘宁边区内部出现了现代世界行政史上罕见的怪事，在每个县城里都出现了两个县政府，有的还就在一条街的对面相对挂牌办公。

事实上，当时各县的政权组织和群众都早已属于共产党领导，因此边区方面的县政府内终日仍是车水马龙，处理县内收粮收税和各种民事，国民党方面的衙门内却整天“无公可办”。外来的党政大员们不仅无人理睬，连衣食钱款都要由国民党当局从外面送来。这些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的人员其实大都是经过专门反共训练的党棍和特务，每日吃饱了饭无正经事可干，就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方百计地寻衅。他们时常以官府名义到下面收粮收税，老百姓自然不肯交，于是发生了打人扣人事件。他们还秘密活动，或收买土匪，或策反共产党的干部，以图在边区内建立活动网。考虑到斗争策略，当时各县中共组织和政府一般不直接出面，而是发动群众和民兵对他们进行有分寸的斗争，双方在边区内部的摩擦日益严重。

“陇东事件”出现和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此铲除内部的这些毒瘤。毛泽东亲自以八路军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起草了致国民政府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的电文。其中指出：

“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团结起见，帮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①

当年在湘江边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润之先生，写这类书稿真是信手拈来。后人多年后看来，仍是运笔精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当时在国民党内属中间派的程潜接到电文后，同意边区各县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等于认可了驱逐国民党县长之举。

对国民党大员既然要“礼送出境”，其方式当然还要讲些礼貌，这也是维护全国统战以合作抗日的需要。先由群众对国民党人员实行包围斗争，然后边区政府出面解围，同时限令迅速离开，并为其举行了欢送宴会。多数国民党官员见势已如此，识趣的吃完饭就在八路军和民兵“护送”下乖乖上路。少数自诩为“朝廷命官”的人拒不肯走，当地政权马上通知伙房不再管饭，县城内任何人也不许卖给他们食物。那时的党组织领导严密，工农兵学商一呼百应，根本不存在不听令的个体户，这些国民党官员就此在边区内根本无法再生存。采取了这种文明驱逐的方式后，陕甘宁边区内部完全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陕甘宁边区出现摩擦与反摩擦的激烈斗争时，山西也发生了新旧军冲突的“晋西事变”。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抗战开始时感到旧军队太陈腐，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建立新式军队，其实是想利用进步势力为自己服务。薄一波等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面帮助阎锡山建军，一面在新军中吸收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使这些为数达7万多人的武装只是名义上服从第二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区长官阎锡山指挥，实际上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在国内反共气焰日益高涨，日本又一再向其诱降的情况下，阎锡山感到抗日使自己吃了大亏，连叫“上当”，于是又依靠其旧军队，设计逮捕新军中的共产党员。1939年11月他先以开会为名召集新军将领前往，然而薄一波等人早已听到风声，知道其中有诈而未到会。12月间阎锡山调动旧军6个军攻击驻晋西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企图将其解除武装或消灭。

发现旧军行动后，新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马上争取主动，撤换了内部不可靠的旧军官，并在八路军协助下坚决还击旧军的进攻。结果除了决死第三纵队中的一部分旧军官拉走少量部队外，其他人员全部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内与八路军会师，经过整军从此正式列入八路军的序列。新军加入八路军后，在山西境内的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中共产党取得绝对优势。不过为团结阎锡山一同抗战并保持全国统战大局，打退旧军进攻后，中共中央主动派萧劲光、王世英找阎锡山谈判，双方停止冲突，划定活动界限。由于这一和缓行动，加上阎锡山与蒋介石、日本也有很深的矛盾，需要在三方之间来回逢源，因此他又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此后阎锡山在晋西南有分别靠近日军占领区、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的三处住所，与三方同时保持电台和人员联系，他本人也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变换居住地点。如需要与共产党打交道时，就住到靠近陕甘宁边区的住所，以示亲共。对这种一切以“存在”为目的的军阀，毛泽东确定的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是非常高超的。

在冀中平原，因当地孤悬敌后，国民党军逃跑后没有留下正规军，后来组织的武装主要是国民党专员张荫梧的所谓“民军”。他们很少打日本，主要是以武力向八路军抢地盘。为解决晋察冀根据地的内部隐患，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在东进的八路军一二〇师的配合下基本消灭了张部。

晋冀鲁豫地区靠近国民党占领区，既有国民党第一战区的正规军在边缘活动，也有其所派的“游击部队”深入内部。1939年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旧将领、曾在1924年亲自出面将溥仪驱赶出宫而著名全国的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其实是一石二鸟之计，让这个杂牌将领去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鹿率部刚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之会面，争取他一致抗战，并说明他的处境，劝其不要为他人作反共工具。可是鹿钟麟一度利令智昏，网罗在敌后活动的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并联合中央军的朱怀冰等部，不断向八路军后方挑起摩擦并夺占地盘。



晋冀鲁豫战略区是延安联系山东乃至华东新四军的主要通道，在全国战局中位置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决不能容许反共顽固势力夺占这一地区。考虑到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又决定争取中间势力同情，以各个击破。

当时争取的主要对象，是统辖河南战地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此人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和内战干将，曾率部攻占鄂豫皖苏区首府金家寨，国民政府特将此地改名“立煌县”，这是继孙中山后民国年间以人名为县名的第二个事例。可是抗战开始后他在忻口与八路军共同作战，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十分佩服，随后访问了延安，深为当地的革命朝气所感动，竟秘密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对这样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内心还捉摸不透，同时又鉴于抗战开始时为让国民党放心已保证过“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党员”，如批准蒋介石手下这位统率大军的人秘密入党，一旦暴露对两党关系影响重大。因此八路军领导人一再向卫立煌表示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却未吸收其入党，同时与他建立了较密切的统战关系。朱怀冰等作为卫立煌的下属，他实际约束不了，不过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求部下不得与八路军摩擦。



1938年4月17日，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延安合影。

同时，中共中央还争取了出身非嫡系、与蒋介石矛盾甚深的原湘军老将程潜。彭德怀从延安回太行的路上经过西安见程，表示要针锋相对：“谁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当时只说了一句：“放第三枪就不对了。”^①这实际上表明了中立派也同意共产党对蒋介石手下的顽固派实行自卫还击，只希望不要太过分。

对于被中共中央称为“中间势力”的地方军阀如孙殿英等，八路军也争取他在反顽斗争中保持中立。孙殿英出身土匪，曾投靠过冯玉祥，以后又反复无常，还盗过清东陵，从来是有奶便是娘。一次各界为孙某人开欢迎会，其老上司冯玉祥到场讲话。一向以诙谐著称的冯玉祥开口就说：“今天我们欢迎的是谁啊？是盗墓贼啊！”当即全场哗然，孙殿英也面色大变。冯玉祥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接着又说：“原来我以为自己把溥仪那个小皇帝从故宫里赶了出去，是革命彻底了。谁知孙军长比我还彻底，连满清的祖坟，还有慈禧那个坏老娘们的墓也给挖了，大家说是不是该向孙军长学习？”一时引得台下个个捧腹，孙本人则哭笑不得。抗战初期孙殿英在豫北割据一块地盘，与八路军尚无冲突而受中央系朱怀冰排挤，当彭德怀遇到他并表示要反摩擦时，他回答说：“按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见他愿保持中立。



“布衣将军”冯玉祥，在抗战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力主同共产党合作。

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八路军于1940年1月集中晋冀鲁豫军区暨一二九师主力，加上聂荣臻亲自率领南下的晋察冀军区的一部，向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发起反击，一举消灭了朱部3个师和鹿钟麟的主力。作战期间卫立煌所率的一战区中央军并无动作，孙殿英部当八路军追击朱怀冰残军从其旁边经过时，仍照常出操，毫不干涉。“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统战工作在反顽斗争发挥了重大威力。

在晋南豫北实施反顽作战期间，考虑到全国抗战的大局，为避免伤害国民政府任命的统辖两省战区的司令大员，彭德怀下令为鹿钟麟及所率的千人卫队放一条路，故意让其逃走。鹿本人跑回重庆，国民党当局曾要他出面“控诉”八路军在敌后如何“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其老上司冯玉祥则告诫他“不要受人利用”。鹿钟麟经此打击清醒了许多，此后不再参加反共活动，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也不去台湾，后来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

太行反顽作战的胜利，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区从西北到华东连成一片。为照顾统一战线大局，当卫立煌提出希望谈判时，毛泽东于1940年3月20日和王稼祥一同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要求：“山西、河北反摩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于4月间亲赴洛阳与卫立煌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划界自守和制止摩擦冲突的协议。此后，华北敌后的国民党势力大都消除，基本由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控制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取得反顽大胜后，据周恩来反映，蒋介石反而是一声不吭。正所谓“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他实际上在暗中加紧策划，华中地区的摩擦和冲突随之升级。

黄桥奏凯

全国的战略格局好比一局棋，作为领袖都要进行通盘考虑和谋划，再落下一个棋子。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要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挺进，要新四军向华中前线开进，也考虑到今后将这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华中地区，如此则全国的棋局皆活。

早在1938年6月日军向徐州大举进攻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毛泽东一面要求八路军向山东、河南发展，一面要求新四军从长江以南进入苏中，这样就初步勾画出一幅发展华中的宏大蓝图。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发展计划进展得比较迟缓，按照某些领导人的总结是晚了两年。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即八路军在华北尚需打开局面，暂时分不出强有力的部队南下。在河南竹沟留守处的部队数量太少，东进后不能马上开辟太大的根据地。不过从主观原因看，当时中共中央对日本人占领武汉后马上停止也估计不足，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长期不愿东进和北上，也影响了发展华中。

项英原为汉口的工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老党员，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资格既老又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头衔，在莫斯科时深受斯大林重视，被赠予手枪。应该肯定项英在中国革命中有过贡献，当年接触过项英的人也反映他为人耿直，缺点是遇大事常犹豫不决，对于独当一面的负责人来说，这恰恰是大忌。

项英在新四军成立时名义上担任副军长，党内职务却是中共东南局书记，因军长叶挺在广州起义后脱党，此时党籍还未恢复，新四军的工作实际上由项英主持。北上抗日前线后，项英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一直未能很好理解，处理问题常常碍于国民党的限制。新四军进入抗日前线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同项英（左）、叶挺（右）合影。

后，只有原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四支队活动于江北的皖中地区，新四军主力被国民党划定在皖南、苏南两块狭小阵地，很少有发展回旋余地，与八路军在敌后数省广阔天地驰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项英估计日军下一步会南下打通浙赣线，国民党军还会溃逃，那时就可以向南大发展。因此他将大批干部和老骨干留在皖南军部，并制订了一个“三山计划”，即在日后发展天目山、黄山、四明山地区作为根据地，进而恢复南方老苏区。然而，日军占领武汉后不再南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共产党也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于是“三山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193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内唯一担任要职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对外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工作，实际上主要任务是向设在新四军军部内的中共东南局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解决新四军发展方向的方针，并处理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总的战略思想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经过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最后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

项英执行这一方针时总是犹犹豫豫，迟迟未大力向北发展。在他看来，江浙一带富庶区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老家，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地方，日本占领后又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带，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五分之三，为日、蒋、汪三方所必争。而且这一带多系平原水网，交通便利，日伪军活动迅速，游击条件艰难，新四军插到这里又可能激化与蒋介石的矛盾。项英担心向这里发展会把统一战线搞垮，总留恋于自己游击活动过的当年老苏区，



老想等待日后实现“三山计划”。有人形容项英是在皖南守株待兔，结果没等到兔子，却等出了一只老虎。

当项英迟疑不决时，1939年秋中共中央派出刘少奇前往中原，领导开展发展华中的工作。1940年年初，八路军派出强有力的老部队2万余人在黄克诚率领



1939年2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做报告。

下进入苏北，会同由竹沟留守处进入豫皖苏交界地区的彭雪枫部，形成了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之势。此时横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间的除了一些孤立的日军据点外，主要就是头顶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和江苏省主席头衔、占据苏北和苏中敌后广大区域的韩德勤。

国民党当局也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南北相向发展之势，为了阻隔其联系，以图将来在战略上各个击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39年年末就以上司身份一再命令新四军，要求将江北的第四、第五支队撤到江南。项英开始还犹豫不决，经中央指示才借故不执行这一命令。当时找借口其实也很容易，因为国民党一向克扣新四军军饷，更极少发弹药。军部则以对下属不能补充饷弹以致指挥不灵为理由，说明如能增加新四军的饷弹，自然可以调动。国民党根本不会向新四军增发饷弹，这样就自然地吧命令顶了回去。

命令不灵，国民党就开始求助于武力进攻一途。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秘密下达了《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要求准备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连系”。根据这一命令，桂系李品仙部开始向鄂东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皖中的张云逸部发起攻击，局部性的武装冲突连续发生。

在这种形势下，江南的新四军一支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于1940年春北渡长江进入苏中。首先通过政治争取的统战工作和军事打击并用，使得泰州李明扬、李长江这“二李”（后来在电影《东进序曲》中称为江州二刘）

同意保持中立。这样新四军在江北站住了脚，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此时，八路军黄克诚部也进入苏北，与陈、粟部南北呼应。

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自然不能容忍八路军、新四军南北会合，何况他把苏中苏北视为自己的地盘，对日寇一向避战，可是对当地的杂牌武装却总是以武力兼并，对共产党更视为眼中钉。他也懂得谋略，为了各个击破，先派人向黄克诚部表示慰问，想以虚伪的缓和暂时稳住北方。同时，他集中手下的主力部队向南方的新四军进逼，企图一战把陈毅、粟裕所部压下长江，当时的口号是“让新四军到长江里吃水”。

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打国民党一省主席所率的大军，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刘少奇在这一时刻拍板下定了决心，从而为中国革命全局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毅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称赞刘少奇到华中后办了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是“几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二是“进行了反摩擦”。对后一点，陈毅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敢打顽固派，一打即能胜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刘少奇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行，而且一定打得赢。”

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南北配合。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中央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之下，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不像国民党那样内部分为各个派系，遇进攻时往往各不相救。韩德勤名义上拥兵10万，真正能听命的却不多，进攻黄桥的主力只有李守维率领的第八十九军1万多人，奉命前去助攻的泰州“二李”早与新四军有统战关系，虽派了一支部队前往，但只是观战。

针对韩德勤的“和北攻南”，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显示反击有理，中共中央明确在重庆告诉国民党当局：“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国民党当局则认为陈毅、黄克诚两部相距大半个江苏省，有数百里间隔，陈部兵力不足万人，黄部也只有2万人，韩德勤足以御北攻南，于是置之不理。新四军部队又采取故意示弱的方式，韩德勤的代表来谈判时，故意向其诉说饷弹不足之苦，让他看小鬼们组成的少年兵。这样韩德勤部更加骄狂，不待准备充分即向黄桥发起大举进攻，为刺激士气并宣布“打进黄桥，放假三天”。衅自彼开，共产党方面正好有了反击的理由，同时得到苏中各界的广泛同情和群众的大力支持。



1940年10月3~4日，国共双方军队在苏中展开了著名的“黄桥决战”。当然，这一“决战”并非全国性的大战，而是决定苏中乃至整个华中全局的决定性一仗。作战的场面也属世界战争史上少有，除交战的双方外，泰州的“二李”以奉“省韩”之命助战的名义派一支部队前来见机行事，驻扬州的日军也派出一个大队前来观望，形成“两方交战、两方观战”的奇特场面。

在陈毅坐镇，粟裕亲临火线指挥下，新四军指战员骁勇异常，又有广大群众助战。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却纪律败坏，士气不振，兵力虽占优势却协同不力，结果遭包抄后大乱，第八十九军全军覆没。据当时苏皖鲁副总指挥卢印泉向重庆所写的报告描绘，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

“余匪抄至背后，即将桥梁破坏，猛攻我三十三师，有一部败退，波及军部危急，仓促间未加部署，下令全军退却，却伏兵四起，纪律不好，人民蜂起追杀（注：此句最精彩！），全军覆没。李军长翁旅长及参谋长团长营长若干人失踪，师长孙启人被俘。”

这个“失踪”的李守维，新四军事后也在找他。交战时没有办法，战斗一结束因考虑到全国统战的大局，还是希望他能活着。随后在河中捞出此人的尸体，据查系逃跑时被拥到水里淹死。李守维是抗战开始后在内战中死亡的第一个国民党军长，陈毅闻讯后心事重重地说：“这样不好！让他自己跑回去多好呢！重庆的顽固派这下子又要叫嚣了！”



油画《新四军往事——陈毅释韩德勤》表现了新四军同国民党发生冲突后还要维持合作抗日。（李明峰作品）

黄桥一战，韩德勤的精锐丧尽，见风使舵的“二李”马上亲近新四军，日军也龟缩回长江边。此时，苏北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以援救新四军为正当理由，大举向南进攻，席卷苏北，于1940年10月10日与向苏中乘胜追击的新四军会师盐城。考虑到要争取维护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利抗战，尽管当时韩德勤逃到兴化这座孤城，但陈毅仍建议留下此人，实行休战，并在名义上仍承认他为江苏省主席。中共中央和重庆的周恩来都赞同陈毅的意见，同意暂时保留韩德勤，这样可以避免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还可以作为交换条件责成重庆方面停止进攻皖南、苏南和皖东等根据地。不过此后一度因考虑不周，还是发起了攻击韩部的曹甸战斗，但又未能奏捷，结果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造成了不利的后果。

总的来看，经黄桥一战和乘胜追击，中国共产党的南北两大主力打通了战略联系，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至此，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从陕甘宁至苏南基本连成一片，人口达到近1亿（包括两面负担区），军队发展到50万，出现了抗日战争以后最好的形势。

此时的反顽斗争不仅取得辉煌胜利，而且极大丰富了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总结出对国民党又打又谈、又斗争又团结的经验。毛泽东就此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以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原则。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进行斗争时，仍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为重，必要的反击也都适可而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国内各阶层和苏联、美国、英国等都反对中国打内战，这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直未敢下决心最后破裂，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局面在局部内战不断的情况下仍能始终得到维持，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皖南悲歌

当苏中的反顽奏凯并使敌后解放区南北相连时，孤悬于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处境却更为危险。项英和叶挺率部在这里虽然已经驻扎了两年多，可是活动范围却只有方圆几十里，正面是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后面和两侧都是国民党军。而且严格来讲，这块小小的地区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因为当地一直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甚至连新四军军部所住的村子里还一直实行着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这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里真是例外。

在项英看来，其他地方摩擦不断，是因为总不遵守国民党的规定；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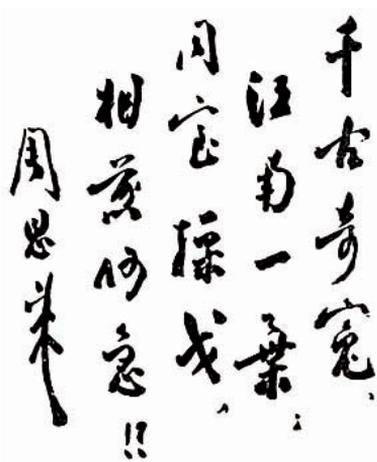


前两年比较平静，与周围国民党军没有发生冲突，是由于自己统战搞得好。可没想到，越是服从于国民党的限制，反而越容易被消灭。这块原先看来最平静的地方，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最大的一场灾难——皖南事变。

按照中共党史书上的划分法，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黄桥决战十几天后，国民党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了《皓电》，电文中先是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打击鹿钟麟、韩德勤的“非法行动”等，随后又要求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接电后于一个月内率部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这一电报突出表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的整个战略有了改变，在隔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破产后，改用“投界有北”的方针，企图将中共的武装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的日本占领区，使其很难有发展余地，更便于被日军消灭。二是国民党内部在中央系以外的最大的杂牌桂系与蒋介石合作，积极参加反共。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本着“争取中间力量”的方针，曾对各杂牌军的首领进行过联络，桂系头目白崇禧曾对周恩来表示友好，同意让李克农率人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桂系军队在华中充当进攻新四军的先锋，白崇禧又出面指责共产党，这使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增强了实力。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使蒋介石感到有利于他反共。美国、英国此时为准备同德、日、法西斯大战，改变了原先不援华的态度，这使过去只有苏联一国援华的情况变为美、英、苏三国同时援华。1940年春天蒋介石曾准备在重庆危急时迁都甘肃天水，背靠苏联和联络陕甘宁边区，所以对反共行动有所限制，此时却大大减少了顾忌。日本也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积极争取议和。这样，蒋介石感到自己处于可以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对共产党开刀也不至于引起大的后果。在发出《皓电》之后，蒋介石即命令华中的汤恩伯、李品仙部东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策应韩德勤，同时以重兵包围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并要其“限期移动”。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谴责国民党当局。

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共中央虽然拒绝了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北撤的要求，却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其实，这是当时改变新四军军部危险处境的唯一办法。还在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一再要求皖南部队转移，但项英以各种理由不主张行动，结果转移一事拖延了下来。当时在苏南担任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曾到军部劝说项英。三年游击战期间他俩在一个草丛和山洞中患难与共，感情很深，此时却总谈不拢。陈毅告别时批评老战友项英说：“我给你排个八字吧，你是‘五心不定，输个干净’。”此“八字”随后被不幸言中。

黄桥决战后，国民党军在苏中和苏北吃了大亏，皖南孤立的新四军军部就成为了其报复的最好目标。周恩来也反映蒋介石当时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①。

面对这种情况，新四军军部两个月内仍迟迟未动，并一再向以顾祝同为首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交涉，表示只有发饷发弹药才能转移。项英及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这一问题上固然有责任，不过近年来公开的档案材料证实，中共中央对当时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反共战事也估计不足。毛泽东在1940年12月间虽催促过项英渡江北上，却也认为“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②。转移一拖再拖，直至蒋介石秘密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8万国民党军从三面向新四军军部包围过来时，新四军军部近万人才于1941年1月4日离开云岭开始转移。

从后来的情况看，新四军军部不仅出发已晚，而且路线也选择不当。国民党军已在东、西、南三面构成包围，新四军军部北面为日军占领区，顾祝同开始向新四军指定要走北面的道路转移到江北，并公开宣传“欢送新四军北上”，以借刀杀人。结果日军调动重兵和军舰封锁安徽中部的长江，在此渡江有极大危险。此时还有一条路，即向东北方向突围，在日军和国民党军交界处穿行。事后看这其实是唯一有可能脱险的道路，可是项英顾虑当地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师拦截也未采用。结果最后确定了一条最不利的道路，即“武装借道”，先向南往茂林行动，冲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再折向东北去苏南。这条路是向国民党军的纵深运动，在政治上给他们宣传新四军“不遵军令南窜”并实施进攻以口实，在军事上是自陷包围圈。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42页。



三条道路可供选择时，为何出此下策？事变发生一周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就提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包围军之罗网。”“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据后来有人回忆，项英、袁国平等决定走这条与北移反方向而行的路线，主要是认为可以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只要冲出山口进入平原，就可自由行动再折向东北。殊不知国民党军已经早有准备，在那个地形非常不利的地方布置了罗网，而毛泽东怀疑的“内奸阴谋”，事后经查也确实存在。

新四军的行动路线，国民党早已知晓并设有埋伏，军部的原参谋处长赵凌波此前起了内奸作用。赵凌波原为国民党川军的下级军官，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俘参加红军，因当地肃反后干部缺额甚大，加上他有一定军事素质且能说会道，在肃反中抓人捕人又表现积极，因此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内战结束前在红二十五军当上了师政委。中共中央为加强新四军从八路军选调一批军事干部时，赵凌波也被选中。皖南的国民党军曾请新四军军部派人去讲游击战的课目，他被派前往，受到各种款待和金钱女色利诱，与对方拉上关系。此后名为驻新四军军部“联络参谋”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找赵凌波，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情报。这些情况当时组织上虽不很清楚，却也有一些异常感觉，于是北撤前夕让他离开军部到第一支队当副司令员（相当于副旅长）。事后据一些负责同志回忆，在第一支队内赵凌波态度反常，故意让部队向错误方向行进，随后即失踪。新四军军部被消灭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刊登赵凌波的“供词”作为“新四军叛变”的根据，证明此人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完全串通一气。

赵凌波投奔国民党后却未得什么要职，开始还被押入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到处劝降，实际上完全成了国民党特务的走狗。后来他被放出监狱，派往淮南一带反共前沿担任一个区的小小行动队长，专门对付当地新四军游击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这个一再叛变、在国共之间投来投去的人的利用价值大概也只有这么大。当地新四军听说赵凌波到此地，正是仇人相遇分外眼红，马上派人袭击干掉了这个叛徒内奸。

由于新四军转移时国民党军已在周围严密戒备，加上鬼使神差地天不助我，行军第一天竟在冬日里下起了雨，道路泥泞难行，结果走了15公里就停了下来，指战员们都去烤棉衣。国民党军完全证实了新四军的移动路线，

马上开始收拢包围。1月6日新四军先卫部队在星潭镇与国民党军打响，一举击溃了其拦截的两个营。叶挺此时主张下决心冲过去，可以在包围圈封死之前较快地突出山口。事后看来，在平原地区即使有重兵围攻也不至于全部覆没。

值此危急关头，被陈毅批评为“五心不定”的项英又犹豫起来，会议一直开了7个小时，最后项英以中共东南局书记的身份否决了叶挺的意见，又让全军掉过头来向北走，这一决定使部队彻底陷入了绝境。当时只有原先在最北面充当后卫的傅秋涛部千余人变为前锋，冲到长江边。日军因见新四军南去而放松警戒，结果傅部成功渡江到达江北，后面的部队则全部被国民党军截断并被包围于茂林附近。当地是高山峡谷区，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四周的高地并构筑了工事，新四军难以突围，在十倍于己的兵力不断围攻下弹尽粮绝，无法支持。

新四军军部被围时，蒋介石又做了两面派的典型表演。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去向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为新四军解围让路，并表示：“我华北、华中将士得四军噩讯，气愤填膺，几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军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

蒋介石没有出面，派刘斐于1月13日出面答复说：“我今天可负责答复，蒋已令贺耀祖（注：侍从室主任）用电话直告顾云，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你们应予帮助，不应为难。至冲突，因估计双方都在严密戒备下，自然容易发生误会。”

其实，这完全是麻痹之计。当天蒋介石命令发起总攻，战至次日新四军军部已无法支持。此时项英因临阵动摇已被中共中央解除职务，代理东南局书记的饶漱石要叶挺去与山下的国民党军谈判，叶挺认为到如此地步新四军已无谈判的资本，可是又不能不服从，之后下山即被扣留。的确，按照无情的军事规律，能战才能和，不能战时也就不可能谈判，去敌方只能被当作俘虏。

接着国民党军冲上来，饶漱石单个混出包围，后来回到江北。袁国平在战斗中已负伤，被老乡抬着走，国民党军冲来时抬担架者逃跑，袁国平不愿当俘虏而举枪自杀，表现还是英勇的。项英倒是有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善于钻山洞隐蔽，他和参谋长周子昆藏了起来而未被发现。随后，突破包围的项英、周子昆隐蔽到长江边的一处山洞里，和新四军参谋处一科科长李志高等共20多人一起准备过江寻找江北指挥部。

由于皖南事变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李志高等人对项英这位首长也是



怨气不已，几次提出要分家，项英则要一起行动过江，结果这些人分成三处住。内部的埋怨情绪给了心怀歹意的副官刘厚总可乘之机。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刘厚总趁大家未醒，开枪打死了项英、周子昆，拿了他们身上的金子、手表和刻有斯大林名字的手枪，跑下山去投奔国民党军。负伤未死的警卫员马上招来其他同志，另找地方掩埋了项、周二首长。直至全国解放后，陈毅等人才将当年老战友的遗骸迁葬南京。

那个叛徒刘厚总并未得到好结果。此人出身绿林，三年游击战争时率领一支小队打得还不错，可是到了新四军后受不了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屡屡受批评，只是项英看中了此人调其来当保卫副官。皖南事变时刘厚总随项英一起突围后，既对革命悲观失望，又发现首长身上带着许多经费，遂起歹意杀心。他投降国民党后黄金、手表都被没收，领人来找项英、周子昆尸体也未发现，仅凭一支刻有斯大林名字的手枪不能取信。结果国民党特务机关把他押到重庆关进白公馆，后来证实项英确已死后也不放他，只分配了他在狱中监视其他人的任务。直至1948年军统特务才宣布释放他回籍，可他此时已无家可回，又没有盘缠，还在狱中落下周身疾病，只得恳求看守所留他当个杂工以混碗饭吃。

翌年11月人民解放军兵临重庆，特务机关把白公馆看守们编为川东游击队。刘厚总虽体衰多病，身手早不似当年任红军游击队长之时，但也作为一名队员加入。因为他明白，国民党军将领投向共产党可以升官受奖，像他这样杀害过新四军高级领导人的叛徒一旦被捉则断无饶恕之理。后来据被俘的军统特务中的目击者称，撤出重庆当天，刘厚总与一伙溃兵抢着上汽车，结果被人用刺刀在屁股上扎了一刀，被甩到路边。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乘吉普车逃跑时，发现刘厚总躺在公路旁哀叫，于是将他拉上车来带了一程，赶上川东游击队时就交给他们。此后刘厚总下落不明，解放军随后在川东剿匪结束时专门查找过这个叛徒，受审的被俘匪特均说未见此人。根据情况分析，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下的混乱逃跑中，已被捅了一刀的刘厚总不可能得到医治，这个丧家犬的身边又无细软，在当地也没有熟人关系，恐怕只有横尸于荒郊野岭了。

新四军军部覆没3天后，蒋介石完全露出真面目。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称“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宣布将其“解散”。同时还称：“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蒋介石的这一行动，使国共关系一时到了接近破裂的边缘。中共中央、毛泽东曾于1月中旬下达命令，要求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并要求华中方面立即消灭韩德勤部，山东方面消灭秦启荣部。许多八路军将领也提出要向国民党军发起报复性进攻。不过，当时负责华中工作的刘少奇于1月15日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提出：“这里的同志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

这种“平心静气”想出来的意见是：“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因此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在重庆的周恩来也主张在政治上采取全面进攻，同时争取中间力量。毛泽东从全局考虑，随之也肯定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展开坚决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势。

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命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保留叶挺军长之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样，在八路军以十八集团军番号名义上仍归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挥外，就此在国内有了一支公开的不属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队。除了原有的9万部队外，中共中央还命令将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彭雪枫两部也改入新四军序列。因为既然已经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这些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打国民党。国民党许多元老对此十分惊恐，认为会造成南方“到处皆匪”的局面。蒋介石也担心局势不可收拾，面见周恩来时提出一种妥协方案，即将新四军原有部队再编一个军，归十八集团军指挥。

对此方案，中共中央认为不可接受，因为如果同意在政治上等于默认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行为。中共中央坚持要求恢复新四军番号，释放叶挺和其他被俘人员，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在政治上低头承认消灭新四军军部是错的，当时也不为对方所接受。国民党军委会自皖南事变起，就停止了对八路军以4.5万人原数额发饷，八路军也停止了对重庆方面发报告。国共双方就此在军事上没有了原来那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已准备与共产党彻底破裂，然而，当时的形势又使他不能如此做。一方面，日军利用国民党军进攻新四军，发起对河南的进攻，说明即使反共，国民党与日本也无法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国内各界谴责国民党方面消灭新四军，要求维护一致抗日的局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驻重庆的苏联大使潘友新（左）同蒋介石夫妇交谈。

就是，国民党当局依靠的美、英两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怕因此影响对日作战。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在皖南事变后即赶到重庆，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不能大量援华，并会见了周恩来。当时主要向中国提供军火的苏联也表示强烈反对蒋介石反共，驻重庆的苏联大使潘友新面见蒋介石，反对中国内战，武官崔可夫则提出苏联将考虑停止援华。

这些情况都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使他在当年2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依赖别人而从无自力更生精神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得不采取缓和措施。3月14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虽回避谈新四军问题，却含糊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按诺言恢复发饷，各地对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却已停止，国共双方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林彪代表毛泽东赴渝见蒋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12月间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政府站到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边，对日本妥协投降的危险基本过去。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已无力援华，美国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靠山。当时美国一面大力援华，一面要求中国国内一致对日作战，罗斯福转告

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内战之用。”此话说明美国从长远角度看并不反对消灭共产党，不过从战时的利益考虑不许“三年之内”这样做。以后的事实证明，在三年后日本战败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果然有了变化。

蒋介石在这种大气候下，不得不在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抗日的关系。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不断的“扫荡”之中，是最困难的阶段。苏联因处于卫国战争的艰难时期，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十分希望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有了一次接近实现的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见。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时说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请毛泽东出来谈一谈。毛泽东马上回电周恩来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①周恩来认为现在与蒋介石见面时机略早。毛泽东认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能做到，是极大利益，哪怕一个具体问题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周恩来则回电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而且有一种可能，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②。

毛泽东这次虽非常想见蒋介石，但经过考虑最后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先派林彪作为代表去西安见蒋，视情况再确定是否亲自去。林彪去见蒋介石有特殊的有利条件，他既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又是闻名全国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且刚刚从苏联回来有国际背景。可是，当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却已经离开，林彪于是赶往重庆。

果然如周恩来所料，蒋介石约毛泽东相见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纯属想改善自己内外形象的政治姿态。林彪以毛泽东个人代表的身份见到蒋介石后，先讲了毛泽东因患病未来，然后又提到内战危险，蒋介石听后就不耐烦，频频看手表，这显然是送客的表示。第二次见面时，林彪一提到新四军，蒋介石居然面红耳赤地说道：

“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你切勿再提新四军，提新四军我是不要听的！林彪同学，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说这个话。”

就这样，有一个双方都不肯让步的新四军问题梗结在那里，国共关系实际上得不到任何发展。能保持军事冲突不大规模地发生，就已是很不易的事情。1943年6月，蒋介石允许周恩来、林彪回延安，双方的谈判又停顿了下

①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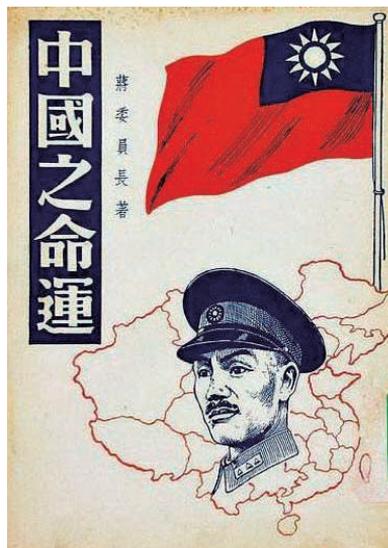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页。



来。此时因美英两国宣布废除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得意之余，又发动了一次反共高潮。

1943年年初“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原本是一场宣传闹剧。美英等国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在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占有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国民党当政后从未取消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各沦陷城市的英美租界占领，并假惺惺地要汪伪政权宣布“收回权益”。落于汉奸之后的国民党面子太过不去，才与美英签订所谓的“平等新约”。此时美英过去享有的在华特权差不多都已被日本剥夺，加上为拉拢中国抗战，索性做个空头人情，承认废除过去的的不平等条约。其实严格而论，某些不平等条件和特权并未取消。如国民党政府曾要求英国废除《中英南京条约》，归还这一条约中割让的香港。尽管此地当时已被日军占领，但丘吉尔政府还是坚决不许，并宣布一定要在战后收回香港。至于美国方面，刚刚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又与国民党签订美军在华人员刑事案件的处理的换文，规定美国人在华犯罪仍由美方处理。以后美军士兵在华强奸妇女及各种犯罪行为，中国司法部门无权过问，以致闹出轰动全国的“沈崇事件”，其“依法”的祸根就在此处。凡此种种，岂不是照常保持在华特权吗？

对于这样一个只有面子上虚荣的所谓“废约”，国民党政权大吹大擂，把蒋介石说成是一雪“百年国耻”的“民族英雄”。1943年春天，经蒋介石授意，曾追随汪精卫当过汉奸后又跑回重庆的文人陶希圣捉刀代笔写下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用蒋介石的名字发表。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按书名之意发挥，鼓吹“中国之命运”要由国民党一党主宰，并宣传什么因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的对外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两年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新式军阀”“变相割据”问题。很明显，这是为发动内战制造理论根据，并显露出不久将要动手的杀机。同年夏天，国民党军的“西北王”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调动两个集团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相机发动进攻。



蒋介石坚持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方针，他在抗战时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实为陶希圣代笔）就系统阐述了其专制主义思想。

中共中央当时在舆论阵地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针对《中国之命运》结束语中“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国”的谬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便没有中国》的社论，以后还以此谱成歌曲，一时唱遍解放区（解放后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中共通过各种渠道一面向国际国内社会大力揭露此事，一面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总动员，准备迎战。当时美英等盟国从对日作战的角度出发，反对中国内战，掌握援华装备分配大权的美军驻华司令史迪威还要国民党受援时保证武器不作为内战之用。这样，总算制止了国民党准备发起的反共战争。

尽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冲突在皖南事件结束后的近四年间有所缓和，可是国特机关却仍加紧对中共地下秘密组织的大破坏。中国共产党也改变了抗战初期作出的不在友党友军内发展组织的许诺。双方除了在战场上和公开政治舞台上的争斗外，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也日益激烈。

自1939年国民党规定限制“异党”，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有合法身份的公开办事处外，其他组织都转入地下隐蔽活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统一领导国统区的工作，下属两个工作委员会：

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负责川、康、云、贵、湘、鄂的地下工作。

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和港澳的地下工作。

此时隐蔽活动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由于当时在国统区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许多秘密组织遭到严重损失。

在中原地区，国民党特务机关于1942年年初策反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逃，由他那里得知了中共河南地下省委的联络网。于是一举抓捕了数百人，破坏了国统区的整个河南地下党。少数党员脱险跑回延安，中共中央负责保卫情报工作的书记康生又称河南省委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近似于后来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以此作为开展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重要缘由。袁晓轩后来参加了军统，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到长春担任特务头子，负责对付中共地下组织。解放时他因未能走脱而改名换姓隐藏，后被公安部门发现线索。这个在街道表现积极、终日满口进步名词（对这些名词他本来就不陌生）的“非党群众”一天突然发现他在延安时的老同学站在面前并大喝“袁晓轩”，开始他还装作听不明白，却也没逃过被



抓进班房的下场。

这一时期中共南委遭到大破坏是最严重的事件，也堪称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最重大的一次打击。由于当时国共双方关系没有公开破裂，国民党不公开宣扬此事。遭到破坏的中共南委原本是对国民党保密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也不便公开提出抗议，只对廖承志等个别人被捕提出交涉。全国解放后，国共双方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方方，副书记为张文彬，相当于一个中央局。南委机关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和福建交界处的山村内，由地方秘密武装掩护。南委负责人主要居住在广东北部城镇内，以隐蔽身份活动。

南委机关暴露并受到重大破坏，如同周恩来后来在中共重庆南方局会议上所总结的那样：“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

周恩来还具体解释说：“因两者在大后方的政策是相矛盾的，只能勉强支持于一时，而不能保存永久，而且必致破坏秘密组织，损失力量。”南委被破坏的源头在江西，正是由于武装组织与省委的联络暴露出破绽。

国共内战停止和南方游击队集结北上组建新四军后，当地仍留下了部分人员和武器，由当地秘密的党组织领导。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贯传统：在任何根据地的主力转移时，总要留下革命火种。不过，当时国内形势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在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诺不在国统区组织武装斗争，这些游击武装就很难开展活动。可是，因当时考虑到今后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又不愿将其解散，只得让骨干人员在较偏僻的地带相对集中居住，还要给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组织供给费用。长此以往，难免不被特务机关侦察发现线索。

例如在井冈山脚下的原湘赣苏区，当地游击队北上后就留下了原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领导的党组织和部分游击队。谭余保赴延安开会后，由原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颜福华担任特委书记，武装人员在山间隐蔽，武装一部埋藏起来，准备在国共破裂或日军占领当地后进行游击战争。原江西、福建苏区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不少这样的地下组织。他们都归江西等省委的统一领导，各省委由南委领导，这种领导又要通过地下交通员的联络来实施。

联络这种分散各处并目标很大的游击网络，交通自然就容易出毛病。1940年国民党特务正是在江西的一个渡口发现两名女交通员可疑，然后就跟踪盯梢。这时特务机关也吸取了经验，改变了内战时期性急的捕人办法。内

战时期发现了共产党员后就马上抓人，审问出线索就迅速开展大搜捕，虽然有时能较快地破坏地下组织，不过也容易打草惊蛇，一般总有些人会闻讯隐蔽或转移。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放长线”的办法，发现线索不马上抓人，而是长期秘密跟踪，找到交通站后又选准时机进行秘密“突击”。

特务机关的所谓“突击”，就是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抓捕交通站负责人。抓到后马上进行审问，以处决的威胁和利诱相结合，迫其叛变并同意为特务机关服务，然后迅速将其放回原处，在秘密进行监视的情况下让交通站继续与各方面保持联络，以顺藤摸瓜。经过很长时间的追寻，国民党特务于1941年7月逮捕了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破坏了整个省委机关。随后，特务又继续以省委的名义与各特委、县委联系，掌握其线索和活动地点后再以一网打尽的方式进行消灭。结果至1942年年初，国民党特务以耐心秘密搜寻的方式，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将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各地组织全部破坏。原来拥有最多武装的湘赣特委遭破坏时，书记颜福华叛变并交出了全部地下组织和经费、武器，自井冈山斗争起江西地区所组织起的革命武装至此全部毁灭。

曾在苏联加入过共产党、此时任赣南专员的蒋经国，在破坏中共江西省委一事中出了大力，得到他父亲的赏识和信任。事实证明，加入过共产党并熟知其活动规律的人一旦投向敌对阵营，那么对原组织的破坏会更严重。

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国民党方面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并以其名义继续与南委联络，因此南委负责人直至1942年春天仍不知这一情况。这时他们虽然已经收到周恩来从重庆方面发来的警告，要求注意国民党方面的破坏，江西省委与南委的联系也出现了中断和异常情况，可是南委领导却未能认识到问题



1939年，蒋经国就任赣南行署专员，1945年，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在此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



的严重性，仍于4月间派原江西省委书记、现任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去广东北部的曲江交通站向江西省委传达指示，并检查江西方面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郭潜虽然参加过长征并在一、四方面军搞过宣传工作，但却是一个带有浪荡习气的文人，举止随便，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他到曲江后，南委发现江西情况不妙，急电要他离开，可郭潜却未及时撤走，结果于5月26日在旅馆内被特务抓捕。经审问和威胁，当晚郭潜就叛变。此后，他被安排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宣传部门从事反共活动，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过一个被称为“中共党史权威”的郭化伦所写的中共党史和许多文章，此人就是郭潜。

郭潜身为南委组织部部长，掌握大量组织系统的秘密。他首先供出了粤北省委的情况，并于第二天带领特务去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其他一些负责人，广东的地下党组织就此又被破坏。

此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已经迅速了解到粤北省委被破坏，立即急电南委，要求通知不久前从香港撤回并隐蔽在曲江的廖承志马上回重庆，如走不了就去其母何香凝处，国民党考虑到“党国元老”的面子也不敢去抓捕。然而南委还没有和廖承志联系上，郭潜又带着特务上门逮捕了廖承志。

接着，郭潜又带领特务直奔南委机关所在地——闽粤边的大埔。6月8日，特务们在高坡镇抓到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部长涂振农。

张文彬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老党员，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长，负责营救过西路军被俘人员，抗战开始时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被捕后英勇不屈，受到特务百般折磨虐待而死于狱中。

涂振农则是一个怕死的软骨头。他在党内也是老资格，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担任过红十军政委。涂振农被捕后供出了南委的许多情况，解放后因其叛变行为受到严惩。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毛泽覃的遗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捕后坚强不屈，并吞金自杀未成。后经周恩来交涉，国民党才将她释放回延安。解放初期，贺怡回江西寻找毛泽东和姐姐所生的男孩以及自己留在当地的孩子时，不幸因车祸而亡。

国民党特务抓到涂振农后，又按线索跟踪追捕，幸亏南委机关所在地周围的群众武装组织掩护，才使方方等领导人得以转移。

得知这一险情后，6月8日周恩来急电南委书记方方，要求南委负责人立即分散隐蔽。随后，南方局又针对南委的危险情况，要求南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停止一切活动，身份可能暴露的党员一律转移。方方经过长途跋涉，于第

二年5月才从福建赶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后跟随周恩来一起回延安。

南委机关遭到破坏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郭潜、涂振农等叛徒提供的线索又破坏了中共广西工委。隐蔽在国统的地下浙江省委也被国民党特务侦破，省委书记刘英被捕。这位刘英当初与叶飞、粟裕等人一起在闽浙赣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也在肃反问题上对叶飞产生过误会。当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上前线后，他留下领导隐蔽工作。刘英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随即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南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坚持战略支点的领导机构，它的破坏对整个华南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中共在华南的工作经过这次打击，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陷入较消沉的状态，有人形容这等于在战略上损失了10万精兵。

当时由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领导的西南地区的地下工作，就取得了许多成绩而没有大的损失。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能起重大作用的秘密党员，如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重要的国民党将领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是长期隐蔽，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其身份只有周恩来等极个别人知道，对其联系也尽量减少并做到隐秘。他们能够向中共中央提供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在国民党军内进行策反，却始终未暴露。



中共在国民党将官中发展的秘密党员张克侠。

四川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根据周恩来等人的要求，实行隐蔽化和社会化的方针。首先是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如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平时有大量特务监视，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与地下党发生联系。地下党机关尽量减少人员，经常变换地址，领导人也要找到正当的社会职业，不致引人怀疑。如领导重庆地下党的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地址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孔原知道，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因此谁也不去廖志高那里，只派交通员定时联系传达指示。川东特委的其他委员，也大都不知廖志高住在哪里。至于国民党当局，更是在几年时间里不知道自己首都所在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是谁。

下层地下党的工作当时虽然开展得轰轰烈烈，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学



生，甚至包括蒋介石的心腹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可是根据周恩来的要求，这些地下据点原则上不能超过5个人，而且都实行单线联系，各党小组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直至1948年春因《挺进报》事件引起的重庆地下党破坏（其实此事暴露也与开展川东游击活动有关），重庆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腹心进行了大量活动，特务机关却



画作《红岩》表现了周恩来同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一起在重庆生活的场面，画面右侧表现了一个特务在监视。（沈嘉蔚作品）

一直无法破获这些秘密机构。这些，证明了周恩来所阐述的原则是正确的，即：“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①

除了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外，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与社会上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军阀中的地方实力派进行了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由于中共坚持斗争，国共之间的一些组织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也组织起来，于1941年3月成立了具有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周恩来经常与民盟的领导人黄炎培、张澜等往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以争取民主的斗争。民盟的成立及开展活动，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蒋介石对外不承认民盟有合法地位，然而，因共产党支持民盟，美国出于其争取中国第三方势力并同情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用心，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之联络，使国民党当局长期不敢加以取缔，只好以特务监视并经常以恐怖手段相威胁。

对于西南的一些受蒋介石排挤的地方军阀如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中共南方局也同他们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这些被称为“国民党杂牌”的军阀过

^①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10页。

去都与红军打过仗，那是因为共产党要“革”他们的“命”并夺其地盘。此时共产党去了西北，威胁他们利益且总想借机消灭他们的是蒋介石，在注重眼前利益的这些实力派看来，与共产党相呼应对保存自己的实力有好处。于是周恩来与刘文辉经联络进行了秘密会晤，并派人到西康省会雅安的刘公馆内设立了电台。在四川另一个军阀潘文华那里，中共也秘密设立了电台。这两处秘密电台一直进行着中共中央与他们的联系，直至1949年年末刘文辉、潘文华二人起义。主持云南的龙云当时也同意与中共联系，让八路军办事处在他的省政府内架设电台，自己也秘密加入民盟，表示以武力作为后盾支持民盟反蒋。

这样，通过出色的统战工作，中共争取到西南的实力派和民盟力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三角关系，使蒋介石两面受敌。蒋介石反共时，西南的实力派和第三方人士竭力反对，因为他们明白只要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腾出手来马上就会收拾他们。同样，当蒋介石要消灭异己时，共产党也在全国大力揭露并加以反对。这种近似“三国演义”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时龙云被蒋介石解决。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国共之间的关系到了临近抗战胜利的1944年又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两个抗日战场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处凯歌高奏时，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极反常的现象，败势已定的日本侵略者又把国民党打得溃退千里，以致社会上都称蒋介石一伙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全国抗战爆发后，与提出“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共产党相比，国民党的抗战是极不彻底的。蒋介石在1939年年初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公开提出抗战的目标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单独抗击日本的局面变为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国共同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的形势，国民党当局此刻才对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废除过去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把宝押在美国必然胜利上，于是坐等胜利，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更趋消沉。除了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地段抵挡一下外，在数千公里的战场上长期实行静坐式的消极避战，只是为了打通国际运输通道以获得物资支援，才在滇西和缅甸战场上向日军发起了抗日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役进攻。



1944年年初，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交通一天天困难的情况，为与南方军保持联系，迫切感到有必要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并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陆上交通，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

自1944年年初起，侵华日军为了发动战略进攻，又补充了大量兵员，使总兵力达70多万人。经过周密准备，日军从同年4月开始发起了“一号作战”，投入兵力约51万人。同年4月日军占领了河南中部广大地区后，就此打通了（北）平汉（口）铁路。

5月下旬，日军又向湖南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6月占领长沙，8月占领衡阳。国民党军由于在湖南遭到失败严重影响了士气，加上政府在惊慌中实施疏散，未能很好地组织，上百万难民到处奔逃，使道路堵塞，前方和后方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就此，中国战场上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11月日军进占广西各重镇，随即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并以一部进入贵州独山。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在浙江和福建沿海也展开了一些进攻，又占领部分城镇，并于10月间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港口福州。1945年1月，日本又打通了武昌至广州的铁路，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也被日军打通。

国民党军在日军近一年的进攻中，损失了60万人的军队，丢失了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并有4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区和缅甸的各个战场上都遭到失败，可是在中国却取得这样的进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惊。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在兵力数量上不仅拥有很大优



油画《中国远征军》表现了卫立煌（画中看地图者，其左为史迪威）指挥远征军反攻滇西取得胜利的情景。（赵力中作品）

势，武器装备通过美援也已得到改善，而且占优势的美国航空兵曾大力出动支援，给日军白天的地面行军和后勤运输造成许多困难，然而国民党战场却仍然出现溃败，还丢失了衡阳、桂林、赣州等重要的空军基地。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腐败的反映。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生活极其痛苦，国民党达官贵人却骄奢淫逸，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当时的生动写照。在后方尤其让广大人民群众痛恨的，就是各地强征壮丁。本来，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是国民的义务，可是有钱人却大都行贿不去当兵，保长们就强迫无钱者去，家属又不给任何优待，阵亡者一般也没有抚恤，加上军中黑暗压迫士兵，结果许多人纷纷逃避兵役。于是征兵就几乎成了用绳索捆壮丁的同义词，那些“持干戈以卫社稷”的士兵，待遇如同囚犯。

1944年8月下旬，有一支驻重庆机房街的运输部队的壮丁们被连长毒打后，血肉模糊地关在屋内，有些还在屋中死去。此情况被邻人发现传出，整个重庆舆论大哗。蒋介石得知后，也于8月30日带上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自己的姑表弟、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陪同下前去视察。当看到屋里惨不忍睹的情景后，蒋介石挥动手杖，对身为中将的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劈头就是一顿打，随后将其关押，还下令枪毙。当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将“总裁”的这种行为当成“关心士兵”的恩惠宣扬，可是，仅仅凭一时之怒将兵役署署长暴打一顿，却不去改变抓壮丁的兵役制度，丝毫于事无补。

当年11月27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说，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其实，鹿钟麟这时说的许多“病故”，也就是像在重庆机房街那种情况下被长官折磨致死。

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百姓和下级士兵几成冻死骨，让那些没有兵血喝、发不了国难财的下级官兵出死力拼战而无怨言，又岂可得呢？在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中，侵华之敌已是强弩之末，精锐师团大半调走，兵力远不及国民党军，火力上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却一直能攻到接近重庆的贵州独山。连蒋介石的心腹、与毛人凤和郑介民并列为军统特务三巨头的唐纵也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河南战役和这次行军的体验，是老百姓已经把我们拒于千里之外，‘政治上军事第



一军人第一’，徒成口号而已！”^①

国民党战场上出现大溃败的时候，敌后解放区战场却展开了局部反攻，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蓬勃大发展。

在1941—1942年两年里，各解放区经历了最困难时期的考验。在敌后各解放区，由于日军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和“强化治安”，根据地大大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其中一面负担的只有2000万人），由于作战损失和为解决经济困难而实行精兵简政，八路军、新四军一度下降到只有40万人。

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战争，却面临着极严重的经济困难。当地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区，老百姓平时自己的口粮大都不足，要养活大批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员更难。抗战头三年国民党只给十八集团军发4.5万人的饷，其实都由八路军和边区政府派人从西安领取，再买日用品和粮食运回，以解决延安当地党政军机关所需，敌后部队的供给则由他们自己在当地解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发饷，并严密封锁边区不许商人往来，延安的机关干部马上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威胁。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动下，全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难关。

得不到苏联的援助，国民党为数很少的军饷也断绝了，反而锻炼出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有了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政治上才能真正独立自主。毛泽东能够不怕美蒋的威胁，顶住苏联的压力，恰恰也在于有这种坚实的基础。

进入1943年，敌后各解放区战胜了敌伪的进攻和破坏，又逐步展开恢复工作，根据地又扩大到8000万人口，军队数量也有所增加。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锻炼，党政军民都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战斗意志也更为顽强，终于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4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中要求对现有的47万人的部队进行整训，以迎接日后的反攻。当时日军为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被迫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大批兵力，许多地区的防务由伪军负责，对敌后解放区的“扫荡”也大都停止。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各解放区发起攻势，扩大根据地，消灭孤立的据点，被日军称为“游击反攻”的局部反攻在敌后战场展开，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弃了大片领土，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入河南新沦陷区，开辟根据地，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同时决定随后派出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和延安的干部大队南下湖南，并要求苏中新四军准备向江南发展，恢复苏南和皖南区域。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解放了1000多万人口，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翌年4月扩大至91万人。

军事力量方面的天平发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政治要求。1944年年末至1945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再度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时，力量和口气就比过去强硬得多。过去国共谈判的主要议题是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和增加军队编制等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就变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正如1944年9月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代表林伯渠、王若飞时所说的那样：“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成为抗日战争末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当时在政治上无合法地位并盼望在国共之间取得一席之地的民主党派也拥护这一主张。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要求，彻底否定了国民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实行的一党专政，无疑是要挖它的老根。蒋介石这个独夫实行的统治，其实与古时坚持权力不可分享、“天无二日”的封建集权制毫无二致，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却联合民主力量对他提出最大的挑战，难怪1945年2月13日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和赫尔利时曾恼怒地这样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中国共产党人却毫不让步。同年夏天，国民参政员左舜生以“第三方人士”的代表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以带讽刺的口气对他说：“谁说‘天无二日’，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当时的形势是“边区的太阳红又红”，重庆方面却日薄西山，这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局势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合作走向决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徐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人：姚丹林

责任编辑：周晶 毛一飞 刘倩

责任技编：许伟斌

封面设计：罗洪

著名军事史专家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最新力作

从合作走向决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阅墙原为主义事
渡尽劫波兄弟存

ISBN 978-7-5454-4736-1



9 787545 447361 >

定价：68.00 元